

人人有機會的「公平」世界： 賽鴿公平性的社會建構與效果

簡好儒*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黃亞晴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台灣賽鴿活動自 1960 年代興起，逐漸發展出有別於其他國家的「幼鴿海翔多關」賽制，結合檯面下大規模的賭金下注與分配，形成龐大的地下經濟體系。透過鴿友訪談、拍賣會參與觀察和歷史資料分析，本研究探討台灣為何發展出獨步全球的賽鴿制度，解釋賽制變遷如何逐漸塑造鴿友集體的公平認知，以及刻意降低強勢者優勢所造成的「機運式公平」，反而意外維繫了廣大鴿友的持續投入，讓參與者相信「人人有機會」，激發鴿友挑戰機運的熱情。本研究與地下經濟中風險控管與社會信任等文獻對話，指出賽鴿活動因結合「合法競技和非法博弈」、「可控的科學理性和不可控機運」，形塑了鴿會和鴿友獨特的風險控管策略，並影響社群的互動和信任關係的建立。台灣賽制的特殊性也影響賽鴿社群成員彼此與對外的互動，凸顯出經濟與社會間既相互穿透又隱含緊張的動態關係。

關鍵詞：賽鴿、海翔、地下經濟、賭博、社會信任

台灣社會學第 32 期（2016 年 12 月），頁 57-108。DOI: 10.6676/TS.2016.32.57

收稿：2016 年 3 月 18 日；接受：2016 年 10 月 17 日。

* 第一及通訊作者。通訊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Email: yujuchien@ntu.edu.tw。

Constructing Fairness: The Evolution and Effects of Pigeon Oceanic Racing in Taiwan

Yu-ju Chi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a-ching Hu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evolution of the unique pigeon oceanic racing in Taiwan by investigating racers' shared values, winning strategi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Taiwan pigeon racing is known as the toughest race in the world. In this so-called "Five-Race Championship," juvenile pigeons have to fly over the open ocean more than five times, if they survive fierce winds and unpredictable weather. Regardless of a young bird's competition records, its racing career finishes in one season. Prize money and associated illegal betting can add up to millions of NT dollars per race. Racers are enchanted by the enormous challenges and rewards. Previous literature tends to suggest that pigeon racers are driven by either personal affection for animals or irrational beliefs in gambling. These individualistic explanations fail to recognize how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hold this racing/gambling industry together. By analyzing archival data, interviewing racers, and observing pigeon bids, we find that Taiwanese pigeon-racing rules gradually evolved to reinforce racers' shared sense of fairness. Pigeon-racing clubs adopted complicated gambling rules, young bird races, tough oceanic racing, and rigorous anti-cheating methods to prevent dishonesty, kidnappings, and other unfair practices. Most racers believe that these tough competitions, though increasing uncertainty, ensure everyone a fair chance of winning. Although most racers recognize that people with greater

economic capital and experiences are advantaged, they admit that luck often intervenes, which makes the races fairer. Racers develop various types of tactical knowledge and cooperative strategies to manage risks. Their collective belief in “fairness by chance” sustains this multibillion dollar gambling industry. Social trust among participants may be undermined, however, because racers tend to keep personal winning tactics a secret.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literature by illustrating how institutional rules, shared values, and social trust co-evolve through gambling activities.

Keywords: pigeon racing, pigeon oceanic racing, underground economy, gambling, social trust

一、前言

賽鴿可說是個既神祕又灰色的活動，遊走在娛樂和地下經濟間的模糊地帶。在一般人印象中，賽鴿和「賭」脫不了關係，高額獎金下產生不少一夜致富的傳奇。媒體上不乏對賽鴿獵奇式的報導，包括鴿子價格如何罕見地高、賽鴿受到怎麼樣高規格照護，或是這項活動如何受黑道把持、舞弊等。的確，台灣的賽鴿獎金，因涉及檯面下插賭，可說是世界最高。¹ 據估計，台灣職業賽鴿人口有六萬，投入相關產業者約三十萬人（黃瑞貞 2007），年產值加上周邊產業上達幾百億元。

雖然賽鴿活動並非台灣獨有，不過台灣卻有全球獨一無二的遊戲規則——完全採用海翔，只用幼鴿競賽，並採用多關制而非單關制計算競賽結果，可說是世界級困難的比賽。在其他國家的賽鴿比賽制度（單關賽）中，一隻鴿子通常可不限次數參賽，也不須飛過缺乏定位線索的茫茫大海。相反地，台灣採用海翔制，海象天候難以預測，一次賽鴿比賽放飛數千隻鴿子，到賽期結束可能只剩幾隻鴿子歸返。由於時限內歸返鴿子比例太低，無法進行到最後一關，而須提前結束比賽的情形時而發生。2004 年由《國家地理雜誌》資助、沈可尚導演的《賽鴿風雲》紀錄片，就清楚地勾畫出台灣賽鴿這種全世界最特殊也極困難的制度，如何吸引形形色色的鴿友投入，每一位都試圖培育出自己引以為傲的賽鴿，以贏得比賽和高額彩金。不過，台灣獨特的賽鴿比賽，雖被視為傲人台灣之光，但也曾在 2014 年被美國動物保護團體 PETA (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指控違反動物權，「鴿屍遍海」的影像流傳於國際，一夕成為「台灣之恥」。

台灣賽鴿活動另一個廣為人知的特色是參與者形形色色，鴿友

1 每次賽鴿結束後領到的實際獎金金額，和當次比賽的鴿子總數，還有插組賭局大小和分配結果有關，因此連同插組的彩金，常有傳聞有鴿友因賽鴿領到數百萬、數千萬，甚至上億彩金。

（也就是賽鴿參與者）遍布社會各階級，從農夫、小販、黑道、公務員、上班族到大老闆都有（溫偉勝 2011: 17；沈可尙 2006）。不過鴿友間似乎不因組成多元而缺乏集體感。相反地，多數我們接觸的鴿友最常問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有沒有養鴿？」一聽我們並無養鴿經驗就回應：「你自己沒有養的話很難懂」或「你要自己養一次才知道」。

外人所不瞭解的鴿友共同經驗，包括了他們忙碌的日常，以及難以用語言明說的技術和經驗。一年鴿賽共有三到四季，²一季比賽加上資格賽可高達六到十關，賽季雖看似集中短短的一、兩個月，但賽前四到八個月就要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準備工作。鴿友須具備的知識、技術也相當繁複。首先，他們須挑選種鴿進行配對、育種，雛鴿誕生後配戴鴿會出售的腳環，並在檢鴿日到鴿會登錄宣告參賽。平日鴿友還須照顧鴿子，如防治寄生蟲和呼吸道感染、施打預防針、調配飼料組成和攝取量、補充營養品、治療生病受傷的鴿子等等。訓練工作則從雛鴿斷乳後的「教乖」開始，³到進行舍外訓練時每天清晨、傍晚讓鴿子環繞鴿舍外飛行一到兩小時；最後進行外訓，將鴿子帶到離家五、十、二十公里外的地點放飛。因此，如果是一個每季都參賽的鴿友，可能一季比賽開始時，同時也在準備育雛下一季的選手鴿，可說每天生活都環繞著鴿子的照顧與操練，因此「鴿子養下去你不能亂跑」（受訪者 Q）。

一聊到養鴿和比賽經驗，鴿友對如何「作出」冠軍鴿的見解常南轅北轍，各有育種、養鴿、訓練的「眉角」，強調「沒有標準答案」，甚至批評他人「膨風」（受訪者 B）。然而，有趣的是，即便鴿友各有自己獨到的經驗，也不表示每個人都能脫穎而出贏得大筆獎金。一季的辛勞和投資很可能因天候不佳而化爲烏有，但仍有源源不

2 北海通常只比春夏秋冬三季，南海則會比到四季，參與者每季皆須繁育新的幼鴿。

3 所謂「斷乳期」是在雛鴿出生後的第 21 天到 28 天，鴿友須開始教導幼鴿自己飲水、進食，認識鴿舍內外的環境。「教乖」則是指讓幼鴿熟悉鴿舍、訓練飛行、放飛後會主動返巢等。

絕的鴿友前仆後繼參與。我們因此好奇，該怎麼理解這群高度歧異的行動者的互動，是什麼原因凝聚鴿友、讓他們持續投入比賽？

究竟台灣如何發展出如此龐大、穩固且獨特的本土地下經濟活動；即使政府曾多次宣示要查緝地下非法賭博，賽鴿卻仍屹立不搖，甚至還演化出獨步全球、極具挑戰的海翔制，吸引遍布台灣各地、各階層的鴿友投入？顯然賽鴿是台灣社會中影響不可小覷，但仍欠缺研究的重要現象。目前台灣社會科學領域對此經驗現象的理解仍十分有限，且少數相關研究又多偏重討論鴿友個別參賽動機，或以犯罪學的角度討論如何查緝或防治，欠缺對賽鴿運作機制、參與者共享意義和社會互動的考察。我們認為，鴿友的個人行動和賽制規則所創造的集體共識緊密關聯；欲瞭解台灣特殊賽鴿活動為何穩固存在，就不能迴避它兼具合法競技和非法賭博，以及既靠運氣又講求「實力」的性質，使賽鴿社群發展出獨特凝聚社群和控管風險的機制，而這些強調「公平」的遊戲規則又進一步形塑了鴿友的行為和互動。我們因此將賽鴿視為是制度化的賭博行動，探討究竟是什麼機制支撐了賽鴿這個龐大地下經濟運作？它如何控管風險、如何影響社群文化與互動，又造成了什麼社會效果？

二、文獻回顧

（一）賽鴿者為何參與？

為什麼賽鴿會成為遍及台灣各縣市、各社會階層的龐大地下經濟活動？鴿友常宣稱其實十比九輸，為什麼還是樂此不疲參加比賽？過去國內外文獻中雖曾對賽鴿參與者的行動提出不同解釋，但很可惜多侷限於描繪鴿友個別參與動機和經驗詮釋，鮮少討論鴿友間的集體共識是如何透過協商形成，更缺乏對台灣特殊的「幼鴿海翔多關」賽制變遷的探究和解釋。

過去國內外文獻對鴿友為何參與賽鴿所提出的解釋，大致可區分為三類。第一類解釋強調台灣賽鴿的非法賭博性質，解釋賽鴿中的

「賭」如何成為鴿友沉迷的心理或經濟趨力（溫偉勝 2011；周佳穎 2008），或者討論由賽鴿衍生的犯罪防治問題（黃瓘祐 2012；范育源 2014）。這類研究或將參與賽鴿視為個人沉迷、受金錢誘惑，或指出養鴿人對鴿子懷有特殊熱情。雖然這類研究解釋了個體動機和行為，卻忽視賽鴿活動社會機制的複雜性，以及這些機制如何影響集體共識和個體行動。

第二類解釋則刻意淡化參與者的經濟動機，試圖凸顯賽鴿的文化意義和社會連帶功能。例如刑淵博(2013)欲破除大眾對賽鴿涉賭的負面印象，採取 Clifford Geertz 的文化詮釋觀點描繪鴿友的認知框架，歸結出鴿友皆具備熱情、耐心和愛鴿的基本條件。這類研究認為，雖然獎（賭）金是吸引台灣鴿友投入的一大動機，但競技比賽帶來的個人滿足與認同感才是關鍵。國外賽鴿研究也發現，賽鴿活動具階級性或性別化的凝聚效果。舉例來說，Martin Johnes (2007) 探討英國在 1870 至 1950 年間的賽鴿活動所反映出的工人階級文化認同。他發現打賭 (betting) 是工人階級文化的一部分，工人以彩券、食物或酒作為賽鴿的賭注，不僅為了贏得比賽，也為了飼養與訓練鴿子帶來的成就感。因為訓練過程須倚靠智識 (intelligence)，如地形學等知識技能，發展出個人養鴿與育種秘笈，使它不僅是「工人的」更是「男人們」的遊戲，成為他們自身、技術和能力的象徵。雖然這類文化性解釋，的確指出賽鴿活動可能建構出共享文化意義，卻同樣缺乏對遊戲規則的深入考察，也無法解釋台灣鴿友形形色色的分化和多元現象。

第三類解釋則隱約指向賽鴿遊戲規則對鴿友的行動意義的重要性；例如 Colin Jerolmack (2013) 考察不同國家賽鴿活動，發現在不同社會情境下人鴿互動關係有別。雖然 Jerolmack 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不同文化中為何出現相異的人鴿關係，但他對美國和南非兩地賽鴿的探究，提供了我們探討台灣獨特賽制的重要參考。他發現，在美國賽鴿俱樂部主要為聯誼性社區組織，鴿友各自和他們的鴿子建立特殊互動，共享著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所說的集體歡騰的儀式效果；鴿友比賽時都經驗著不確定性帶來的脆弱與等待鴿子的孤獨，共同進入

一場和自然對抗的比賽；相較之下，南非百萬獎金賽鴿 (MDPR) 則較接近韋伯 (Max Weber) 定義的理性化組織，全球各地鴿友都可參加，鴿子則集中由專家照顧和訓練，賽鴿者反而與他們的鴿子異化疏離，關注的是競爭、公平和獎金。Jerolmack (2013) 的研究凸顯賽制可能影響和限制參與者的意義框架。針對台灣賽鴿活動，王淳堯 (2007) 則將賽鴿視為「遊戲」，分析鴿友如何理解遊戲規則，產生他們個別對賽鴿知識、空間設計、和訓練等文化地景的認識。Jerolmack (2013) 和王淳堯 (2007) 的研究都點出賽制會影響鴿友的經驗和詮釋，顯示鴿友不光只因個人動機或文化意義而投入賽鴿，也深受社會機制的影響；不過他們仍較著重詮釋行動者個體經驗，並未特別探討社群的集體性或規則如何建構，也難以協助我們解釋為何台灣鴿友投入相似活動，但個別間的遊戲經驗、知識技巧，以及對活動意義的詮釋卻存在高度歧異。

我們認為，過去研究較缺乏對於賽鴿背後社會機制和社群互動的考察；而台灣兼具合法競技和非法博奕的賽鴿，既是本地賽鴿的關鍵特殊性，也是台灣賽鴿總蒙上神祕面紗的主因。現有賽鴿研究都未曾探討台灣鴿友為了完成賭局、凝聚眾人共識，而不斷創造、修改這個社會機制的過程，因此無法精準解釋台灣賽鴿活動的複雜性格，以及社群內既團結又分化的現象。本文因此欲探討，除了個別鴿友的心理驅力或社群文化意義之外，是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與互動規則，才能維持鴿友們穩定參與涉及非法博奕的活動、持續投入比賽，並且打造賽鴿社群的特殊在地性格。

(二) 地下經濟的風險控管：集體與個體

有別於其他國家，台灣賽鴿檯面上是競技比賽，檯面下則有複雜的插賭運作。這樣濃烈的賭博特質，令本地賽鴿活動位處地下經濟的灰色地帶，與其他國家的競技樣貌顯著不同。由於台灣賽鴿活動涉賭的敏感性，鴿友多半十分低調，相關社會科學研究寥寥可數，欠缺對這類地下經濟何以能控管風險、穩固運作的解釋。

根據我們的觀察，在賽鴿這樣的地下經濟中，參與者須面對兩個不同層次的風險，第一層為非法經濟活動因不受國家制度規範所衍生的交易風險，例如當鴿會與鴿友面對比賽作弊、倒債、黑道勒索或警方查緝等情況時，如何避免或控管個人機會主義行為，讓經濟交易活動順利進行。第二層則是個人得失的計算和風險控管，當賭博本身無可避免伴隨著比賽失利或插組失誤輸錢的可能時，行動者又如何因應這種個人的經濟風險。

針對第一層因國家法律缺席，參與地下經濟的行動者須避免機會主義造成的風險；過去相關研究已發現，地下經濟或民間借貸多仰賴某些社會條件來維持，像是社會關係、人際網絡、社會資本，甚至暴力資本等等（羅家德 2001；康涵真 1994；葉俊男 2012）。例如羅家德 (2001) 和康涵真 (1994) 都指出人際關係的信任是民間金融（如標會、借貸、非正式融資等）的重要基礎。葉俊男 (2012) 研究六合彩交易體系則更進一步指出，行動者除了仰賴社會網絡來維護交易安全外，還會利用非正式的暴力機制（如黑道制裁），並發展出管控債務關係、分散債權的多樣化玩法，來確保賭債償還。這類探討地下經濟交易者如何因應法律缺席風險的研究，豐富了經濟社會學對交易風險控管的論點，指出地下經濟須靠多重機制來維持：不單單只有長久以來經濟社會學者所強調的社會鑲嵌 (embeddedness) (Granovetter 1985) 而已；一旦交易破裂或利益糾紛產生，還可能援引其他機制，如暴力資本進行制裁，或者在交易網絡的運作中就設計出層層的風險控管方式。循著這樣的理路，我們也想問，賽鴿社群集體因應風險的社會機制是什麼？它只靠人際連帶或黑道介入來避免機會主義的風險嗎？

至於第二層，賭博無可避免伴隨著風險和不確定性。賽鴿比賽時受到氣候、運氣等人為無法操控因素影響，鴿友自身不斷面對賭金損失的不確定性時，他們又怎麼評估與降低參與賽鴿的風險？

近來探討賭博與風險關係的社會學研究，開始將後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不同形式且隨處可見的賭博，理解為當代對機會 (chance)、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和風險 (risk) 制度化的認知傾向 (Reith 2002;

Cosgrave 2006: 3)。Rebecca Cassidy 等人亦指出，賭未必完全是一般認知中不理性的行為，多半涉及特殊文化意義或在地知識，以及制度化的風險管理 (Cassidy et al. 2013)。有關不同類型賭博或投資的研究，則顯示包括莊家或賭徒等不同行動者，會發展出降低風險的策略。舉例來說，吳宗昇 (2011) 研究股票投資市場，發現股市參與者的優勢取決於他們認識資訊的能力和取得資訊的管道，擁有知識和管道的行動者，就得以減少「摸黑交易」的風險。Stine Simonsen Puri (2013) 研究有關印度賭馬活動也發現，簽注站所公布的賠率，並不是單靠賽馬的實力或下注總金額多寡而決定。由於眾人相信內線交易會影響賭局結果，像是可以收買騎師操弄比賽，因此即使是合法簽注站的經營者，也會想辦法觀察其他簽注站公布的賠率，甚至去非法簽注站簽注以分散自家風險。

也就是說，社會學對賭博或投機行為的分析，既不是經濟學式將賭博視為個人的理性計算或消費選擇的觀點，也非心理學式將從事賭博的參與者視為個體病態成癮，或非理性受情緒影響的失序行為；而更強調賭博所涉及社會的、集體的和文化機制，試圖解釋是什麼樣的社會互動情境將個體機運和風險給制度化 (Cosgrave 2006)。賭博參與者多半並非被動地接受風險或無理性的投資行為，事實上會發展出個人策略或社會機制來控管經濟損失的風險。

基於以上博弈和投機行為的相關研究，我們想進一步探究，賽鴿活動參與者如何發展出集體和個人控管交易風險的機制，鴿友本身又如何分析和詮釋參賽的風險和回報，發展其風險管理策略或詮釋？賽鴿和其他的博弈活動有何不同？我們試圖追溯台灣賽制變遷的歷史，探究社群如何集體控管風險和形塑共識，以及這些社會性機制又如何影響鴿友個人風險控管的策略。

(三) 信任：地下經濟中的社會關係

再進一步追問，在賽鴿這樣灰色的經濟社會空間的運作中，鴿友的互動基礎和社會關係究竟是什麼？在競技賭博規則不斷制度化和變

遷的過程中，究竟是增強了行動者彼此間的信任和連帶，還是因為制度確立而降低社會人際網絡對交易穩定化的重要性？

經濟社會學和網絡研究普遍認為信任 (trust) 可以穩定社會關係和經濟交易，強調社會關係與經濟邏輯間的交織關係 (Granovetter 1985; Polanyi 2001[1944])；有關非正式經濟的研究也發現，非正式經濟的運作對社會網絡的依賴比正式經濟來得深，也更強調信任的重要性 (羅家德 2001；康涵真 1994)。那麼，社會信任的根源究竟是什麼，怎麼產生？Niklas Luhmann (1980) 的社會系統理論將信任區分為人際信任與系統信任，前者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後者則是人對群體、對機構組織，或是對制度的信任。Lynne Zucker (1986) 則進一步將信任的來源區分為三種，包括：(1) 基於過去互動經驗所產生的信任 (process-based)，(2) 基於個人背景特質所產生的信任 (characteristic-based)，以及 (3) 基於制度 (正式社會結構) 所產生的信任 (institutional-based)，例如因契約、證照、評鑑制度等所產生的信任。Luhmann (1980) 與 Zucker (1986) 都認為，現代社會的運作越來越仰賴非人際的制度性信任；隨著時代變遷，制度性信任會逐漸取代人際信任。也就是說，信任的基礎可以獨立於個人而存在，未必是基於過去的互動經驗或個人特質而產生，當社會機制有效運作時，人們也能有不依附於個人特質或社會關係的信任。

少數地下經濟研究，則觸及了非法活動如何導致信任的異質性與它在交易中的動態變化，點出行動者關係有可能增強、破裂，也可能朝著其他不同方向演變。例如葉俊男 (2012) 針對六合彩參與者的研究，發現參與者除了因社會連帶而促成交易，還須參照彼此的 (經濟) 能力 (competence)、名聲 (reputation) 而形成信任，因此信任不只是考量情感關係，同時也包含理性的計算和決策。此外，六合彩網絡還有上下層級網絡性質的不同，上層網絡更強調工具理性的關係，而下層網絡則多建立在情感關係；當信任破裂時，則轉由暴力資本上場維持秩序。馬財專 (2010) 研究販毒者的交易網絡關係同樣發現，販毒或吸毒者的個人信任機制，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產生轉變。吸毒者初

期多透過強信任關係取得毒品，隨著他們愈來愈熟悉毒品交易市場和販毒管道，以及經濟資源消耗，則可能逐漸擴大信任對象的範圍。但販毒市場中爲了規避被查緝的風險，也可能出現對信任建立的干擾，例如某些販毒者認爲四處都充滿風險，因此很難建立長期信任。這些研究顯示，在地下經濟的交易中，經濟交易邏輯和人際信任關係未必總是正向地相輔相成，亦有可能破滅或難以建立，也會因具體的情境發生動態發展和調整。

我們循著地下經濟裡經濟邏輯與社會關係是複雜交織且動態發展的思考理路，則想探問：鴿友之間究竟是如何互動？他們對彼此的信任是建立在人際的還是非人際信任之上？經濟邏輯和社會關係間究竟是緊密相依，還是可能產生緊張的張力？由於賽鴿遊戲規則，相當程度上協助參與者建立對彼此互動的預期，降低社會行動中的不確定性，並促成穩定互動，因此本文圍繞著賽鴿制度性的安排探問，受眾人認可的社會機制的出現，究竟如何影響了參與者間的信任關係，又是否改變了社會關係和互動？我們認爲，研究賽鴿這種「比賽競技合法，但下注博弈非法」的特殊地下經濟，將有助我們理解社會關係在參與交易過程中的動態變化。

本文聚焦探究台灣賽鴿遊戲規則的歷史演化過程，以及它所造成的經濟行動和社會互動效果，試圖回答以下問題：(1) 台灣爲何發展出獨步全球的幼鴿海翔多關賽制？(2) 鴿會和鴿友如何管控地下經濟和賭博衍生的風險？(3) 鴿友如何影響、理解和因應賽制規則的變遷？爲什麼鴿友大多相信人人都有贏的希望？真的是這樣嗎？(4) 賽鴿遊戲規則變遷如何影響了鴿友間的信任關係和互動策略？過去賽鴿研究鮮少討論賽鴿的遊戲規則和運作機制，如何形塑行動者行動意義和社會互動，這也是本文試圖填補的理論和經驗空缺。整體來說，我們將台灣賽鴿視爲一個制度性的賭博活動，探究它所獨有的幼鴿海翔多關賽制爲何出現，並分析這樣的社會機制如何運作和維繫，如何形塑制度性的認知傾向，影響社群文化與互動，從而穩固這樣一個龐大、穩定且深具台灣特色的地下經濟社群。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包括報章雜誌、賽鴿雜誌的報導，以及訪談和參與觀察。歷史資料方面，我們蒐集了《台灣信鴿》、《賽鴿》、《五洲賽鴿》等賽鴿雜誌，瞭解自 1960 年代賽鴿雜誌出現至今，制度和組織的轉變歷程。訪談方面，我們訪談了 15 位鴿友或相關產業人士，除了 A、B、C 的訪談是在一家鴿店同時進行，J 和 K 為夫妻在其住家同時受訪，其餘都是單獨訪問受訪者（參見表 1）。受訪者 A、L 和 N 除了自行參賽，也曾參與鴿會運作。訪談藉由半結構式、開放的問題，詢問鴿友對賽鴿規則、參與方式和知識技術的看法，以探究賽鴿運作的邏輯和行動者的詮釋框架。最後，我們在 2015 年 5 月拜訪一間北部鴿會，與工作人員進行非正式訪談，瞭解鴿會運作方式、工作內容和比賽流程。在 2015 年 3 月和 5 月，我們分別參加兩次賽

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職業	地區	訪談日期	備註
A	男	51-60	賽鴿周邊產業	中部	2015 年 3 月 14 日	有參賽
B	男	41-50	賽鴿			有參賽
C	男	61-70	公（退休）			有參賽
D	男	41-50	賽鴿	中部	2015 年 3 月 14 日	有參賽
E	男	41-50	公	中部	2015 年 3 月 14 日	有參賽
F	男	41-50	賽鴿周邊產業	北部	2015 年 4 月 16 日	未參賽
G	男	41-50	工	中部	2015 年 4 月 26 日	已停賽
H	男	51-60	公	北部	2015 年 4 月 30 日	有參賽
J	女	41-50	家管	中部	2015 年 5 月 06 日	有參賽
K	男	41-50	商			有參賽
L	男	51-60	商	中部	2015 年 5 月 16 日	有參賽
M	男	41-50	賽鴿	南部	2015 年 9 月 8 日	有參賽
N	男	71-80	商	南部	2015 年 9 月 8 日	已停賽
P	男	51-60	賽鴿	中部	2016 年 2 月 11 日	有參賽
Q	男	31-40	賽鴿	中部	2016 年 3 月 5 日	有參賽

鴿拍賣會，觀察鴿友評斷鴿子、競標的過程，並向在場鴿友請教與尋找適合受訪者。少數受訪鴿友即是在拍賣會場中交談、徵詢同意後進行訪問；訪談結果皆打成逐字稿分析。

四、追求「公平」的賽制演化史

訪談中我們接觸了各地形形色色的鴿友，各有不同的心得和經驗，顯示出這個社群的確十分異質多元。但我們也發現，即使鴿友的參與動機和詮釋不一，他們幾乎異口同聲認同台灣的幼鴿海翔制，呈現強大的集體共識。出乎我們意料地，鴿友口徑一致地強調台灣賽鴿活動最難，但很「公平」。甚至有鴿友評論：「沒有什麼比賽鴿更公平的事。在台灣上法院還不一定可以馬上討回公道，台灣有哪一條法律被遵守，沒有。可是賽鴿活動不一樣，規定大家都遵守，結果一翻兩瞪眼，很公平」（2015年5月9日所做的田野筆記）。

一路順著這樣的發現追尋，我們逐漸意識到，賽鴿規則設計和調整所塑造出的集體「公平感」，正是這個地下經濟管控風險的重要一環，它創造了鴿友相信鴿賽是公平的集體信念，也成了凝聚社群的重要關鍵。究竟鴿友對公平性的認知，是怎麼建構出來的呢？過去研究已顯示，鴿會必須維持公平、公正、公開（王淳堯 2007: 66-67），但我們發現，鴿友所強調的公平，其實不單只是各個鴿會運作是否達成比賽的公平，更是鴿友對整體遊戲規則的制度性信任，他們相信幼鴿海翔賽制讓比賽更不易受人為操弄、眾人立足點平等。鴿友如此強調公平，正反映出他們對鴿賽可能「不公平」的敏感，包括擔憂舞弊扭曲競賽結果，或對比賽彩金集中於少數人手上感到反彈等等。所以，賽鴿的賽制變遷，可說是鴿界集體為了因應參與者利益和認同變動，嘗試建構公平共識而演化的動態過程。

賽鴿活動從戰後至今已經歷多次改變，主要目的幾乎都是為了減少舞弊和不公平情事發生。台灣賽鴿活動最早可追溯到日治時期的「傳書鴿」比賽；戰後初期因為戒嚴，民間活動相當程度受到警備總

部管控，在嚴密登記規定下發展出民間團體主辦的賽鴿活動。⁴

從 1960 年代中期之後，賽鴿越來越具規模，賽制也由一開始的單關制轉為多關制。比賽的舉辦單位亦在 1980 年代後期起，漸漸從包括賽鴿協會和信鴿協會等「公會」主導，轉而由「私人會」取代。⁵ 各公會主導遊戲規則和彩金分配，地下插組的玩法更隨著賭金增加的方式益發多元。以下說明賽鴿制度發展的幾項重要變革，以及它們如何逐漸提升競賽公平性，導致鴿賽難度大幅提高。

（一）1960 年代後期：陸翔幼鴿賽和多關制興起

賽鴿興起初期皆為陸翔制：鴿子集中帶到其他區域放飛，可能是南北對飛或東西向返巢，例如北部地區的參賽鴿由枋寮或鵝鑾鼻放飛，中部地區的參賽鴿帶到花蓮附近飛越中央山脈返巢。早期選手鴿可重複參賽，並選出年度優秀選手鴿或鴿王、鴿后。不過 1960 年代中期鴿界開始出現呼聲，質疑成鴿和幼鴿一起比賽不公平，要求分組競賽，於是發展出「特種（比）環」（即幼鴿賽）。受訪者 F 分析，限定幼鴿賽讓參賽者的立足點公平，同時也增加了鴿會經濟利益：

台灣都是幼鴿賽，國外才有成鴿賽……那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Money，錢啦。為什麼？他每一次賣一個腳環他就收一次錢啦……啊如果你的老鴿子你已經有腳環了，你就不用再跟我買腳環，你就剩下一個報名費而已。所以他們每一次比賽完，那個鴿子就不用了，你下次要比賽就再來一批新的。以前的陸翔就是說大家要求公平，所以大家就要求日齡要一

4 「台灣省軍鴿教養會」是第一個民間賽鴿組織，於 1950 年成立，由國防部管轄；1958 年，該會更名為「台灣省軍鴿協會」；1960 年，又改名為「台灣省信鴿協會」，自此成為正式的人民團體；同年，「中華民國賽鴿協會」也登記成立（劉人傑 1962；王淳堯 2007）。這兩個早期的賽鴿組織，是現在鴿友所稱的「公會」。

5 1987 年解嚴之後，人民團體組織法廢除。鴿會不再由「台灣省信鴿協會」及「中華民國賽鴿協會」這兩個組織下的各地分支會主導，各地的私人鴿會遂如雨後春筍般產生。過去公會會長由會員遴選，但私人鴿會興起後不再有選舉制度，是由各個會長透過本身經濟能力和人際網絡邀集鴿友參與他所主導的競翔活動（尹培華 2007）。

樣，這樣起跑點才公平。你不能說你早養八個月、十個月，他後面才比較小的。有一些年齡差距，他可能那麼認為說訓練的基礎不一樣。

也有鴿友分析，幼鴿賽避免經驗較豐富的成鴿持續獲勝的可能，因為選手鴿都是新手更容易達到冠軍輪替的效果。基於以上種種理由，台灣賽鴿活動在戰後迅速變成一鴿一生只能比一次的幼鴿賽制，迥異於其他國家選手鴿一生可反覆參賽的制度。往後出現的海翔制也延續這樣的幼鴿賽制，南海放飛比賽只採用 3 到 4 個月的幼鴿，北海的選手鴿則為 6 到 8 個月的幼鴿。

此外，1960 年代中期多關賽制也逐漸成形，隨著關制增加比賽難度亦提高。當時，信鴿協會與賽鴿協會的各地分支會逐漸發展出綜合多關制：由一開始單關制，發展出二關綜合，爾後又發展為秋季三關、春季五關，還有些地方發展出七關、八關等賽制。⁶在多關制中，選手鴿必須完成上一關，才能進入下一關比賽；最後以鴿子各關分速（每分鐘飛翔公尺數）加總成績來決定牠的綜合表現。

也是在這個時期，台灣賽鴿見證賽鴿賭博逐漸制度化的過程。幼鴿賽與多關制皆提高了比賽的難度和獎金，並衍生相應賭法。受訪鴿友多回憶，早期比賽只有獎狀或錦旗，賭局只是鴿友們私下活動，並非由鴿會主導。受訪者 L 強調自己小時候參加賽鴿是「一種榮譽感，養鴿子是有成就感」，獎金很少，就算賭也是私下三、五個人的賭注。後來賭局隨著私人鴿會主導而日益制度化，成了半公開的「插組」，亦即除了腳環獎金，⁷ 另外還提供鴿友對比賽結果下注。受訪者 H 回憶：「私下插如果透過鴿會的話，基本上鴿會就是會跟你抽

6 目前海翔的主流賽制都是幼鴿五關制，鴿子必須完成前一關且不被淘汰，才能進入下一關。淘汰的基礎除了有沒有返航，也包括採計鴿子飛翔的分速是否達標，也就是實飛距離除以實飛時間（分鐘）來計算。但是目前每個鴿會的規則不同，有的鴿會在正式比賽的五關之前，還有一到兩次成功飛返的資格賽；有的甚至規定賽鴿在資格賽必須要達到一定的分速（例如 500 公尺/分鐘或 800 公尺/分鐘等）才能參加正式比賽。

7 腳環獎金指的是選手鴿參賽都須購買腳環，而所有的腳環費用加總後，會依照排名，如前 30 名，共同分得腳環總獎金。

成，它是一個仲介幫你處理這些事情，當作一個公正人就會跟你抽一點百分比。」此後鴿會發展出不同金額的鴿環，依照腳環金額大小各自成立賭局。⁸ 隨著難度不斷提高、獎金和插組彩金日益增加，吸引愈來愈多鴿友投入，締造了 1980 年代後期的賽鴿黃金時代。

對許多鴿友來說，多關賽制中每關都能插組下注，亦是他們持續參賽的強大誘因：「因為每一關都在分錢的啦，我不用在最後一關才分錢啦，我搞不好飛了兩關我就有錢。」（受訪者 D）金錢利益涉入和賭局的逐漸制度化，使得鴿友愈來愈重視比賽公平性和金錢回報，更強調比賽立足點相同，催生了台灣特有的一生只參賽一次的幼鴿賽。

（二）1990 年代：為防弊發展出的海翔賽制

1980 年代後期，賽鴿陸翔制達到頂峰，獎（賭）金愈來愈高，但也隨之出現種種為人詬病的弊端，包括網鴿集團、AB 櫥等層出不窮的作弊方式。鴿界為了控管比賽結果遭扭曲的風險，轉而開創出獨步世界的海翔制。1980 年代末海翔制由南部發起先聲，後來擴散到北部，到了 1990 年代末期，海翔已完全取代陸翔。不過海翔仍有南北海之別：北海集鴿後由基隆港出海放飛，南海則是從高雄港出海，每關都比上一關直線距離拉得更長，最遠達到距陸地 300 至 400 公里外海處。⁹

從歷史發展來看，海翔的出現和制度化，同樣是鴿界嘗試透過修改遊戲規則，來因應當時社群面對的舞弊和勒贖風險，以及參與者因而流失等重大危機所致。1980 年代中後期，台灣信鴿協會的會員代表大會臨時動議中，就討論了如何防治私製腳環、包飛機偷渡賽鴿等舞

8 受訪者 H 回憶，當時鴿友除了買公環之外，可以根據自己經濟能力再加買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不等的腳環，或者用一百元買「套環」：「他們各自賭他們自己的。比如說，我拿二十塊的腳環，你只有權利跟別人分這二十塊的腳環錢。它分成十等，你只能分這一塊，那三十塊的就分三十塊的，五十塊的分這五十塊的腳環錢。可是我如果拿了一百塊的呢？我這一百塊的就進來吃你們這三種」（2015/4/30）。

9 中部以北的鴿會多半比北海，中部以南則多比南海；至於桃竹苗、台中、彰化等地的鴿會，則是北海或南海任一都可以。

弊行爲，以及網鴿勒贖的歪風。¹⁰ 除此之外，1980 年代「大家樂」興盛吸引了賭客游資，不少協會小組因而搖搖欲墜或解散，¹¹ 信鴿協會的會員人數遞減。鴿界於是不得不面對「網鴿」和作弊猖獗的挑戰，重建社群活力。

網鴿是鴿友經常遇到且深惡痛絕的威脅。俗稱「網仔」或「網仔腳」的有心人士，會在山區架設大片鳥網獵捕賽鴿，或將網來的鴿子賤價出售，或利用腳環資料直接向鴿主勒索，不從則傷害鴿子，或剪掉腳環放回，使鴿子喪失比賽資格。加上網鴿手法持續演化，索求也愈來愈高；勒索手法亦千奇百怪，有的網鴿者會直接索取現金、有的則將落網鴿子做記號後放回，一旦鴿子日後獲獎再上門暴力索取分紅。索求金額隨著愈接近正式比賽、選手鴿背負更高賭金而提高。一般來說，鴿主在評估賭金損失後，通常會盡量將鴿子贖回。由於賽鴿競技本身是合法行爲，因此國家在網鴿或倒會問題上並未完全缺席；例如，鴿友可以檢舉綁架與勒索等，或動用私人警政關係要求警方去掃網執法，遇到會長捲款潛逃等糾紛也可以訴諸法律，¹² 但基本上國家公權力對相關糾紛多被動放任，鮮少主動介入。

不過，當鴿友遇上其他涉及比賽舞弊、非法插組等糾紛時，不但很難要求公權力介入調解、恐怕還得防著警方查緝。也就是說，網鴿、舞弊基本上還是賽鴿社群須自行面對的威脅。受訪鴿友泰半對賽鴿舞弊手法如數家珍。舉例來說，1980 年代起，「AB 櫥」作弊手法出現，也就是鴿主訓練選手鴿習慣 A、B 兩個不同的鴿舍，一爲目的地 A、另一個則是較靠近放飛點的 B。因此比賽放飛後，鴿子通常會直接飛回距離較近的 B 鴿舍；作弊的鴿主取得鴿子後，再以其他交通工具將鴿子送到目的地 A 鴿舍，贏取獎金。隨著交通工具演化，作弊

10 資料來源：《台灣信鴿》，1986 年，第 38 期。

11 資料來源：《台灣信鴿》，1987 年，第 39 期。受訪者 L 也表示，當年曾經因爲大家樂盛行，而使台灣鴿界式微了八到十年之久（2015/5/16）。

12 私人鴿會的確可能因爲會長周轉不靈或捲款潛逃而發生倒會的現象，亦有受害者選擇控告當事人詐欺、背信，尋求法律協助的案例。不過大多數情況下，鴿友也深知賽鴿活動遊走涉賭的法律邊緣，事發後多自認倒楣不敢報案，因此未曝光案件恐怕更多。

者可利用的交通網絡也越來越多元：

牠一定會停比較近的家嘛……把牠接過來上高速公路以後，然後好幾部車輪流就去衝。這樣比牠飛得還要可能更快。那後來就有人用飛機，用飛機運。比如說，以前你載鴿子可以隨身行李託運鴿子。所以後來假日的時候規定鴿子不能託運，平常日才可以。所以如果你到高雄教乖的話，你到小港馬上去寄，它班機馬上到台北，台北又到松山馬上放了，就比人家快。這個是作弊的方式。後來高鐵又通了，坐高鐵也很快。（受訪者 F）

爲了防止 AB 櫥舞弊，中部陸翔比賽地區曾修正賽事，發展出一關放北部、一關放南部的防弊方式。不過，「後來整個陸翔，高鐵通了之後整個就崩潰了，非得一定要放海上不可」（受訪者 F）。

於是 1980 年代中期，鴿界開始嚴肅討論起海翔制，認爲一方面可減少鴿子在陸上的飛行距離，減少中網機率，另一方面也能降低 AB 櫥舞弊，維持比賽公平。1987 年夏季，台南縣賽鴿協會率先試探性舉辦海上放飛鴿賽，鴿友稱爲「南海比賽」。不過，此次試辦的歸返率非常低，首次正式海翔賽則等到 1989 年才舉辦。海上競翔初期遭遇不少瓶頸，諸如鴿友認同度不高、歸返率低，經過鴿會努力克服種種操作難題，才逐漸被接受並風行南部（尹培華 2007）。

也不是一次就是全部變海翔，有一些會就是開始辦，有些人就開始去放，說歸返率不是只有零點五趴，或是說只有不到兩成的歸返率。可能六成、七成，天氣好變到八、九成，然後慢慢慢慢大家就開始接受了。所以那也是經過一段的調適期的。然後陸上就愈來愈少，海上就愈來愈多。（受訪者 F）

此後北部亦仿照南海比賽創立北海競翔，由基隆港出海放飛。海翔如新制度論所說的制度同型 (isomorphism) 過程 (Meyer and Rowan 1977;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逐漸遍及全台。海翔雖不能完全杜絕網鴿和舞弊，但鴿友普遍認同它可大幅降低鴿子飛越山區中網的機率，¹³ 也能降低 AB 櫥作弊空間，使得比賽較能維持公平，逐漸擴及全台。

由於海翔制較受海象和氣候影響，賽鴿難度大幅提高，也意外帶來另一個形塑鴿友「公平」認同的效果——鴿賽從此較不像陸翔時期有固定常勝軍，反而重新吸引回逐漸喪失比賽興趣的業餘小戶玩家。受訪者 H 分析：

（陸翔比賽末期）鴿種跟養鴿的手法，已經被抓到了，很清楚，哪些鴿種……大概有什麼樣的飛行條件，然後在什麼樣的教練……特殊的飼養管理之下，天下無敵。幾乎每一次陸翔都是固定那幾個、那種賽鴿企業集團哪！都賭得很大，那賭金一次都一、兩千萬那一種，那常常會跟你拿上億，拿到一般的散……就是散戶啊，「小咖」就常常在輸，比不過他們，所以鴿會就會想辦法，那個時候陸翔就變得小了，就剩幾個「大咖」的在玩。

和 H 一樣，經歷陸翔轉海翔歷史的鴿友幾乎都觀察到，陸翔的強豪¹⁴ 轉海翔後優勢未必能延續，打破了過去常勝軍固定的現象，反而提高了其他鴿友投入興趣。「如果讓我找到了（贏的規律），我出面把錢贏光，那鴿會就全部解散了，是不是。就是因為找不到，所以現在還很多謎，陸上之所以會結束，也是因為（贏的規律）被找到了」（受訪者 H）。

13 過去陸翔制採南北對飛或者東西向返巢，很難不通過山區，因此會增加訓練或比賽時鴿子中網的機會。

14 所謂強豪，在鴿界指的是時常贏得比賽、分得高額獎金的好手。

在分析這段賽制演化歷史後，我們發現，由於賽鴿比賽競技合法而插組非法的模糊性，因此與其他類型地下經濟相比，不完全僅仰賴人際網絡來控管風險、維繫交易存在。賽鴿社群的維繫除了鑲嵌在鴿友社會互動上，更仰賴集體建構出對賽制公平性的信任，較接近 Luhmann (1980) 與 Zucker (1986) 所說的系統性或制度性信任。賽鴿因涉及巨額賭金運作，不斷面臨作弊手法演化或鴿友流失等威脅，鴿界得因應鴿友的利益和認同而逐漸調整賽制，於是規則慢慢朝向幼鴿、多關和海翔演化。這種透過眾人評估遊戲結果，集體參與打造「公平」賽制的修正，說服了大家作弊因素已被控制，也減少贏家過於穩定，或其他不公平現象發生。至於鴿友所理解到的公平感受其實很複雜，包括希望鴿賽活動無外力介入、立足點公平，也包括對比賽彩金是否過度集中、自己因此缺乏贏的機會等評估。

當然，賽制調整所創造出的制度性信任，並不表示鴿友的心理趨力或相互間社會關係對這種地下經濟交易的穩固就不重要。鴿友可能因迥異的心理驅力，例如爲了比贏的面子、成就感，或賭贏巨額彩金等而反覆參賽。但整體來說，鴿會安排的比賽是否公平，也是他們考量是否繼續參賽的條件。我們接下來就要分析，個別鴿會如何進一步鞏固「公平」感，強化鴿友的信任並吸引他們參與。

五、鴿會打造鴿友公平感： 制度性信任的日常運作

如前所述，在解嚴後公會逐漸沒落，目前鴿賽主要都由地方較具財力或公信力的人物所主導的私人鴿會來執行。鴿友可各自選擇臨近自家鴿舍、自己信任、玩法亦可以接受的鴿會參加比賽。¹⁵ 但主辦和參與鴿賽的雙方，其實都得承受地下經濟的風險。從鴿會組織的角度

15 大部分受訪鴿友認為，公會經營時期，鴿會可能較常花錢聯誼報公帳，導致鴿會腐敗失去公信力，而私人會可讓鴿友繳交的费用較大比例成爲彩金，並不會不好。

來說，主導賽事可能遭遇作弊波及鴿會經營、提供插注機會以抽佣獲利須承受法律查緝，也可能遇到賭客拖欠債務或賭客流失而無法營運的風險。對鴿友來說，參加的私人鴿會若經營不善，會長捲款倒會甚至包弊、舞弊，亦會對個人帶來損失。尤其是，賽鴿插組所贏得的彩金其實是非法博弈，雙方遇到糾紛也不能訴諸公權力，因此雙方都必須對比賽規則、確保防弊、彩金的分配作出評估並達成共識。也就是說，維繫鴿賽除了須建立鴿友對海翔幼鴿賽制的信任，更需要透過鴿會和鴿友不斷互動，繼續強化其公平性和可信度。

我們發現，個別鴿會和鴿友間，除了可能因社會網絡而產生聯結外，更仰賴鴿會妥善管理風險、執行提昇鴿友公平感的機制，這些機制也成為個別鴿會社群進行風險控管的重要一環。畢竟一旦鴿會被懷疑不公、舞弊或金流不透明，很可能就面臨倒閉的危機。目前各鴿會競技與下注規則都很雷同，尤其每個鴿會都強調自己嚴格執行檢鴿、比賽，與確保賭金流動等規則；鴿會多靠微調兩個機制——防弊手段及插組規則——來確保賽事的公平性，鞏固制度性信任。首先，鴿會強調落實防弊制度，以減少人為操弄機會，讓鴿友相信大家站在相同立足點，自己不會因人為舞弊吃虧。其次，鴿會會改進插組規則，以避免彩金過度集中於少數人，讓小戶鴿友相信自己也有機會，吸引他們持續參與。

（一）防弊制度確保的公平

各個鴿會自 1980 年代末都逐漸引入被鴿友認為較公平的幼鴿海翔制，並特別強調嚴格執行防弊、凸顯自身賽局公平性。目前在彼此仿效學習之下，各個鴿會運作方式和防弊手法已大同小異，除了南海和北海的賽制略有差異。

一般鴿會一季的運作，從參與鴿賽的鴿友事先按照比賽期程孵育幼鴿開始。鴿友須繳交報鴿費，並向鴿會購買選手幼鴿的腳環，¹⁶ 於

16 報鴿費視個別鴿會而定，通常一羽鴿 500 元左右。

出生後一周內套上。腳環價格按鴿會規定，可能一環 1000 元、3000 元或更高。鴿會通常規定各報名鴿舍一次須有一定數量的鴿子參賽（例如 10 隻或 15 隻）。¹⁷

鴿會除了賣鴿環，還須提供鴿主電子感應板和鴿鐘，並在賽程中訂定固定驗鴿時程，確認鴿子不被掉包。比賽當天由鴿會統一集鴿出海，統一放飛。早期還沒有鴿鐘時，鴿主要等鴿子歸巢後，用腳踏車或跑步將鴿子送回鴿會，因此鴿友會抱怨距離或交通工具不同造成誤差，當時鴿會會視鴿舍距離扣一點時間來處理。後來引進了機械打卡鴿鐘，直到目前普遍採用電子鴿鐘，已大幅減少鴿舍位置對比賽結果的影響。電子鴿鐘流行之後，返巢鴿子通過感應板就立即傳送紀錄回鴿會，可精準計算飛翔分速；有的系統甚至可和鴿友手機直接連線，大幅降低不公平的爭議。

此外，目前鴿會都會執行繁複的檢鴿手段以避免「AB 鴿」或「丟包」等作弊手法。所謂「AB 鴿」是指鴿主同時訓練兩隻（或多隻）鴿子，複製腳環後，將 A 鴿送去放飛，卻提前將留在原地的 B 鴿送去檢驗贏得比賽。至於「丟包」，是指鴿主於比賽前偷回鴿子，另行提早放飛。為防止這類作弊情事扭曲比賽結果，賽期中鴿會都必須反覆檢鴿、確認鴿子身分：如幼鴿在出生一周即掛環；賽前鴿會須驗環號、於翅膀蓋章、拍照（眼睛、翅膀等）存證，以避免其他鴿子冒充。有的鴿會另外會加封一組密碼腳環來「封環」確保。¹⁸ 比賽當天集鴿時，鴿會也必須再驗環號、封印等，以確認鴿子身分、避免掉包或作弊。

近來各鴿會多已採用先進科技防弊，如集鴿過程全程錄影、採用先進附 GPS 電子腳環和電子鴿鐘即時感應；也有鴿會在集鴿當天會抽籤決定鴿子放置貨櫃位置，避免鴿友抱怨籠子位置影響結果；鴿籠需

17 不過鴿友自己未必需要孵育到這個數量，因為也可以接受他人「寄」鴿（多半指代他人飼育訓練鴿子），與自己的鴿子一起參加比賽。

18 實際作法如用當天報紙隨機剪下來分成兩半，一半貼到鴿環上，再用塑膠膠加在鴿環外，並用吹風機固定；另一半報紙則留存，往後用來比對確認鴿子身分。

加上封條避免有人開啓掉包等。有的鴿會另會抽籤選一位鴿友負責押解鴿車到港口上船；海上放鴿時皆作實況錄影在第四台轉播，供鴿主全程監控。

鴿會如此繁複、謹慎地執行防弊措施，是爲了讓鴿友相信賽局中沒有人爲舞弊、每個人面對的挑戰相同。舉例來說，受訪者 G 表示：

運氣因為大家都有，比賽是公平的，為什麼別人能夠回來，你不回來，雖然是有運氣的成分，但是運氣不可能永遠是……運氣不好……公平然後不要有舞弊的現象……比如說有人作弊的話，那你再好的鴿子、再多的資金也是會輸啊。

受訪者 K 則用賽鴿和賽馬相比，強調鴿子獨自完成比賽、且鴿會執行了多重防弊規則，因此不若賽馬結果易受賽馬師操縱：

人爲，我今天來講，賽馬好了，你從小馬一直培培培培，培到大馬，開始跑，開始追，吼，一場一場都冠軍，可是今天，如果有一個比較魁梧的，比較好的（後面解釋是賭馬者為當權者或黑道），你這匹馬一定要跑輸那匹馬，你跑贏了，那你就慘了，你敢跑贏嗎？……如果是鴿子，你每一個人都在自己家裡願，對不對，你要買，錢來嘛……今天講啊，為什麼大家會熱衷於這個，因為它人爲因素少。

鴿會努力避免人爲因素的介入，目的是進一步鞏固鴿友的非人際信任；鴿會被期待、也的確嚴格執行各種繁複流程和驗鴿手續，在在顯現出防弊是維繫鴿友公平感受和參與的關鍵。鴿友 P 和 L 都評論，鴿會須建立健全防弊制度才能永續經營：

一般（鴿）會想要賺錢，它不會讓作弊的害了這個會沒了，害他們不能賺錢。所以他們會去想那些防弊的方法，不會讓

作弊的吃去，讓會可以繼續經營下去，這些會想要賺錢，他們會努力想辦法。（受訪者 P）

我說辦鴿會，是把你的制度建立得很完整，很嚴謹，這是……就防止作弊是你辦會的會長，你的責任義務，而不是一直說想辦法在這邊增加這個賭法，再增加賭的方式，夠了啦。這個……你假如好好的很嚴謹，我說好啊，這給你的獎金提高了，大家的賭金又增加了，給你到一億，多兩千萬好不好，那假如有人作弊被抓到，你整個會散了嘛，我說我告訴他說，一個會長的人要很嚴謹去思考說，我們這裡面的制度，哪些地方還有瑕疵、有漏洞或者怎麼樣，或者甚至你要去防堵人家作弊，你應該心思是放在這邊。（受訪者 L）

因此，雖然各鴿會防弊的具體措施不盡相同，但都會互相仿效，強化自己的可信與運作嚴謹性，亦逐漸採納相似的防弊程序或設備。

（二）插組規則設計形塑的公平

鴿會除了強化防弊制度，還會微調插組規則強化鴿友的公平感，吸引更多鴿友參與。一個會長經營鴿會的利潤，主要來自比賽獎金和彩金的固定抽成，¹⁹ 所以參與比賽的鴿友愈多、彩金額度愈高，對鴿友愈有吸引力，會長也可抽得更高利潤。

在台灣，賽鴿獎金可分為明組和暗組。明組是指比賽的正式獎金，是鴿會依照當期比賽賣腳環和報鴿費所得，扣掉行政成本，再依比賽結果發放的金額。暗組則是鴿會另外讓鴿友檯面下插組賭博的彩金，鴿會一般於比賽前三到五個月（幼鴿訓練期）起，就按月要求參賽鴿友填寫不同關次的下注單，²⁰ 並且要求在固定時間內匯交賭金到

19 通常是當期比賽鴿友全部繳交金額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20 鴿友稱一次下注單為一「封」，指的是鴿會規定在固定時間完成三關、四關、五關或單關進行插注，鴿友填好交給鴿會後即完成一封。

鴿會才算完成下注，以確保資金交易確實執行。

就暗組來說，各鴿會插組方式亦已大同小異，但插法規則可能略有不同；例如如何賭「多隻組」、²¹ 允不允許「連碰」、²² 同一隻鴿可否重複賭不同多隻組，還有是否有其他「連號組」、「花色組」等下注規範等。我們發現，有些鴿會插組規則的差異和調整，與它們試圖爲了提昇鴿友刺激感，並避免少數人贏得太多獎金有關。舉例來說，有些鴿會限制「伯馬」，²³ 也就是減少一人獨得獎金的情形，以維持鴿友對彩金分配的公平感和繼續參與的經濟條件。受訪者 E 就指出：

還有伯馬……譬如說第三關的時候，全部的鴿子都沒回來，就只有一隻回來，那隻就可以拿總獎金的百分之二十（而非全部）……啊他就是不要讓人拿去，他怕人拿鎖去（所有獎金被一人獨得）……那個會裡啊，他要給大家，越多人領到，越多人領到這個會才會持續下去……你如果是固定人拿去，（鴿友）就跑掉了……你頂多，我二十趴給你拿走，所以這八十趴我退回給前一關的……這個也是經過累積……因為有些防弊端才又改成這制度的。要不然有些伯馬全拿的耶。

另外，除了事先插組下注，有的鴿會亦發展出單關「加報」的玩法，俗稱「關關開」；讓鴿主在每一關的比賽前兩到三天進行下注，且每關結束後就會開始分此關加報彩金。舉例來說，若此鴿子、或此組合（如 1 號與 3 號鴿）在第一關順利飛回，鴿主可在第二關開始前

21 一般鴿會可從兩隻組、三隻組到五隻組下注，有的到六隻組或更高。

22 「連碰」指的是將所有可能排列組合都插賭，例如兩隻組連碰，指的是把自己全部鴿子中任兩隻的排列組合都下注，因此需要很大的資金成本。各個鴿會會明確規定一隻鴿子可下注的次數，例如一隻鴿子只能填寫三次。

23 「伯馬」指的是若全（鴿）會只有一隻鴿子歸返，贏者便可獨得所有彩金。過往陸翔制，鴿會並未對伯馬作出限制，到海翔制時才開始限制伯馬贏得獎金的比例，例如只能獲得百分之二十的插組獎金，剩下的百分之八十退回前一關進行分配。

加報，若第二關亦飛回，可分得此關加報獎金。鴿主也可決定是否繼續投入第三關加報；但若鴿子沒飛回，則可不繼續投入資金。

加報一方面可降低鴿友經濟風險，另一方面也讓分得獎金的鴿友有更充裕資金投入下一關賭注。若只有事前插組賭法，一旦鴿子在訓練或比賽過程中迷失、被擄或失格，鴿主即喪失全部賭金。加報則讓鴿主更能掌握鴿子飛翔能力，視其表現下注，避免過早插組的風險。加報賭法開創出更保險、多元且豐沛的下注機會，吸引鴿友投入更多資金。

我們看到，鴿會不斷調整遊戲規則延續賽鴿活動，既加強鴿友的信任感，也維持鴿友持續參與的動機。隨著賽制和插組規則調整，雖然大部分鴿友看穿「玩鴿子的人，十個人有九個半是輸的」（受訪者H），卻因為同意遊戲規則是公平的、評估自己不會因舞弊吃虧，或認為彩金分配公平而願意投入。

至於鴿會這些調整或作法是否能贏得鴿友信任呢？從鴿友的角度來看，目前各地私人鴿會林立，臨近自己鴿舍的鴿會往往不只一家，鴿友因此相對較有選擇鴿會的能動性。鴿友一般會多方評估會長人品、鴿會是否嚴謹執行防弊機制，以及考量總體參與人數（參與者愈多、插組賭贏的金額通常愈高）等多重因素，來決定是否參加一個鴿會。若他們懷疑某家鴿會經營管理不善，未必會考量人情壓力，²⁴通常能輕易轉換到其他鴿會比賽。在經營競爭壓力下，鴿會落實防弊機制和建立口碑，贏取鴿友信任實為重要。會長通常會避嫌，不參與自家鴿會的比賽，避免鴿友懷疑自己從中作梗。鴿友亦多表示，賭金交還和分配應該確保「公開、透明」。根據王淳堯(2007)的研究，過去賽鴿常發生會長倒會、捲款潛逃問題，鴿會組織於是發展出不同的保

24 我們的訪談顯示，在中南部或較小的鴿會，鴿友和會長間有較緊密的人際連帶，鴿會常是大家平日聚集聊天的集散地。相對而言，北部鴿會的角色傾向為主辦單位，較少鴿友沒事來串門子，鴿友也不一定認識鴿會會長本人，例如我們拜訪的一家規模不小的北部鴿會就是如此。

證機制來控管相關風險，例如透過會長有形或無形提出經濟擔保，或是讓財務更加透明化來取信鴿友。²⁵

也就是說，鴿友對鴿會信任的基礎可能是雙重的：除了人際關係的連帶（如朋友都在這個鴿會）或會長聲譽（人品、夠力）以外，更強調組織持續維持賽事和交易的公平（是否嚴格防弊）。如受訪者 Q 所言，鴿友的考量同時包括對會長人品和財務的個人性評估，也包含對於組織執行制度的系統性信任：

這個鴿會的制度比較健全，我們當然會往這個鴿會去放啊……有些粉鳥會（鴿會）的會長對這個防範就很高，你現在這個鴿舍，我發覺你有問題，鴿友也說你有問題，比較健全的鴿會，可能就會說，好你要放我也不能說不讓你放，因為我們沒有抓到證據嘛，現在假如說是 AB 櫥的，會長每個禮拜去給你抽查三次呢，每個禮拜都三次、三次、三次，你作（弊）得了嗎？一定作不了，所以你說我們選鴿會，就會看這個會長裡面的工作人員有沒有在做事情，我們都會去評估啦。再來就是，我們說比較「社會氣口」（台語），有夠力嗎？我們也會去評估啦，他是不是一個很有公信力的人，他今天如果做不好的話，他的名聲就沒了，所以這個都有差啦。

和整體賽制變遷一樣，各個鴿會不斷調整防弊制度和插組規則，也凸顯出它們在日常運作中試圖打造社群信任的動態過程。套一句受訪者 L 的話：「公平是怎麼樣，就是說他的一個會裡面的制度；但是會裡制度即使很健全，不代表說這個健全的制度拿到哪個會會適用，它再修正，它是要修正。」

25 王淳堯指出，鴿會會透過以下方式來取信鴿友：(1) 鴿會成立或選舉時，會長強調擁有償還虧損的證明（不論是有形或無形）與口頭保證，(2) 成立會費支出的獨立帳戶，或另設監事來監督金錢提領，(3) 儘量將鴿會財務透明化，允許會員針對會費支出提出質疑。不過這點公會較能做到，私人會多強調財務為商業機密，不可輕易洩漏（王淳堯 2007: 41-42）。

我們從鴿會與鴿友雙方不斷互動協商、生產「公平性」的過程可看出，賽鴿防弊和插組制度的出現、變遷和穩固化，並非鴿會單方推動造成的，而是在與鴿友互動的過程中持續修正，集體共同協商生產個人信任與制度信任。不管是整體賽制中「幼鴿海翔多關制」的出現，還是個別鴿會對檢鴿、插注等規則的修正，在在都顯示賽鴿社群成員具有調動制度的強大能力，以及地下經濟須透過社會機制維繫的重要性。

六、「機運式公平」： 不確定如影隨形

那麼，這些爲了防弊、強化公平性的賽制，真的確保了公平嗎？我們發現，台灣「幼鴿海翔多關」添增運氣的影響、刻意降低強勢者優勢；這樣困難的賽制固然對鴿友造成更大挑戰，但卻意外創造了公平的另一層意義，深化了鴿友「人人有機會」的信念。困難的幼鴿海翔多關賽，不但添增比賽的樂趣、刺激和遊戲感，激發了鴿友挑戰的興味，也意味人人都有機會贏得比賽和獎金。

（一）衡量賽鴿實力主要靠血統，卻又難以捉摸

其他國家的賽鴿活動，鴿友可參考一隻鴿子多年、多次比賽的翔績來育種，而台灣幼鴿一生只比一次的賽制，讓鴿友很難評估一隻選手鴿的實力。幼鴿孵育後，幾天內就要掛環，幾個月內就要上場比賽，每次都是新手初登場。雖然鴿友很愛用籃球賽、棒球賽等人類運動來比擬賽鴿，但事實上，幼鴿賽卻是以一次性表現來決定輸贏和能力，無法透過反覆練習、多次比賽來提昇或判斷選手的技能與表現；

26 鴿子的生命週期平均約15年左右，不過比賽期間迷航或死亡的鴿子比例不低。鴿主多會將能在時間限制內飛回並得等的鴿子留下來育種，至於失格飛回的鴿子，則視鴿主的考量，例如是否有作種鴿的價值、種鴿舍是否有足夠的空間等而定。一般來說，鴿子兩歲至六歲是最佳的繁衍期，因此每隔一段時間，鴿主會淘汰年紀過大、品質不佳的種鴿，引進新種鴿，以避免高齡繁殖與近親繁殖，影響後代品質（受訪者H）。

且鴿子一旦一次比賽失格，往往面臨的是淘汰甚至死亡的下場。²⁶

台灣鴿友除了缺乏過去翔績作為衡量實力的參考，還須在幼鴿尚未發育或訓練前，就逐月繳交各關插組單，因此他們十分仰賴對幼鴿血統的認識與猜測，²⁷血統於是成為鴿友評價鴿子能力的最重要指標。大多數鴿友著迷於育種學，強調「龍配龍、鳳配鳳」，相信父母鴿（而非幼鴿本身）的比賽紀錄是評判好鴿的基礎。台灣選手鴿輸贏賽績都只有一次，多數鴿友會將比賽得獎鴿留下來育種；也有不少經濟實力較雄厚的鴿友，著迷於向國外買冠軍鴿配種，參考牠們在國外多年多次賽績史判斷優劣。如受訪者 B 所說的，國外「有國家賽，有省賽，有地方的俱樂部賽」，提供了評量一隻鴿子實力（血統）更為詳盡的依據；因此早從陸翔時期起，台灣就興起炒作國外名鴿血統。

我們觀察的兩場拍賣會裡，拍賣的鴿子多來自比利時、荷蘭，為多次得獎鴿，或與得獎鴿有親緣關係的鴿子，拍賣價從底價一萬元到數十萬元不等。拍賣前鴿友會先獲得鴿子血緣、賽績等詳盡資訊，也有機會一一觸摸鑑賞鴿子；之後再各自依對其血統、紀錄和自身經驗的評價競標。

鴿友幾乎都異口同聲強調血統的重要，但也都承認不確定性持續存在。不少鴿友評論遺傳學很奇妙又充滿變數，冠軍鴿的後代能否再奪佳績仍不可知。更何況，陸翔轉海翔後，鴿子表現與血統的相關性更不如前。

受訪者 H 就指出，陸翔發展到後期，已漸漸被人摸索出鴿子的「黃金配對」：「只要配這個（血統）組合，很少輸錢，誰養都一樣，一個人養到它都會贏很多錢。」但海翔因氣候海象等不確定因素，結果更受運氣左右：「贏的人沒固定啊，贏的品種也沒固定啊，然後直接下來的直系也沒固定啊」（受訪者 D）。受訪者 G 也認為血統未必穩定可靠：「（育種工程）很浩大，而且這個沒辦法事先驗

27 單關組的插組單最晚寫，是在正式比賽前一周填寫完畢。不過二關、三關或五關綜合的插組單，則是在比賽前四、五個月前就已填寫好。

證，大家也認為說這個得獎的比較好呀，遺傳能力可能比較好，事實上是牠另外一個兄妹比較好，這種情況常常發生……遺傳的事情真的是……很難掌控。」

受訪者 F 同樣分析：

大部分大概會留下來就是說，牠有飛出來有成績就會留下來。但是好的成績的比賽，不一定就是好的種鴿。那是兩回事……為什麼？牠的表現說不定是因為牠的運氣好，說不定是因為他的管理、或其他因素，可是站在遺傳的基礎，牠不一定是很穩定的遺傳……也許這一代的表現（好），牠做出下一代，牠可能又不一定。它遺傳是一個很荒謬的東西。它沒有說這次比賽龍生龍，鳳生鳳，你下次一定還會出冠軍鴿。大部分不會出冠軍鴿啦。

雖然血統是少數鴿友可掌握的因素，但不管父母有再好的血統和紀錄，台灣比賽幼鴿都必須經歷海翔不可知的嚴酷試煉，才能檢證鴿主的育種邏輯。養鴿「沒有一定的公式」（受訪者 L）可說是鴿友的共識。認真鑽研育種的 H 分析：

所以妳說血統，哪一個血統適合什麼天、什麼季節，吼……當然如果妳籠統要講血統，這些都是血統的影響，但是如果更 detail 就是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比賽制度，吼……這個不同的天候，適合不同的血統、不同的家族的鴿子，這個就剛剛講的，鴿子是有專長的，妳講血統，必須要再補一句說：不同的血統都有牠自己的專長這樣，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比賽制度、不同的天候，都有它適合的血統的鴿子，要這樣比較完整。

有趣的是，即使血統的影響難以穩定掌握，大部分鴿友卻還是堅

信建立在血統和訓練的科學理性是他們比贏的基礎，相信有一套穩定的育種規則有待摸索，只是須採納其他因素綜合考量，才能充分發揮其能力，因此鴿友著迷於不斷鑽研尋找穩贏的黃金血統組合。

（二）培養實力的知識技術較難累積

除了血統，鴿友要贏還須培養訓練和照護鴿子的知識技術。幼鴿孵出後，參賽鴿友花時間日日放飛、外訓，讓鴿子學會返巢，還得多方鑽研飼料配方、補品、藥物等知識，甚至學會自行判斷鴿子傷病，就是為了加強選手鴿比賽順利，且快速返航的「實力」。不過，海翔卻充滿著考驗鴿友實力的不可控變數。

「海翔比較難啊，難度很高啊」（受訪者 D）是受訪鴿友的共識。受訪者 B 說：「我們台灣人吼，這句話比較嚴重啦，我們台灣把鴿子當成海鷗飛。」受訪者 H 也說：「台灣有幾乎三分之一的鴿子，後來都被高壓電線收走了，另外三分之一是被海收走了，或者飛到外島去，最後留下來的可能不到三分之一，就是海翔最後能回到家、能完成的，不到三分之一。」海翔最大障礙，來自於海上缺乏定位線索。其中北海又被認為比南海更難，因為從北海飛回來的登陸點比較窄，只有在富貴角和三貂角一帶，一旦鴿子錯過登陸點，就可能誤飛到東海岸，很難再跨越山脈返巢；南海則相對登陸面積較大。²⁸ 海翔的另一個障礙則是天候。南部氣流相對比較穩定，北海則氣候、海象較不穩定；但春秋兩季悶熱時，不管是南海或北海賽，對鴿子都是莫大挑戰。除了鴿子貼著海面飛受到氣切、海浪衝擊等考驗，變幻莫測的壞天氣更造成極大考驗。和其他國家陸翔賽鴿一定要好天氣才進行比賽不同，台灣因為有船運運輸成本的考量，一隻鴿船出海裝載著多家鴿會的鴿子同時放飛，因此除非遇到颱風，否則不論下雨、壞天氣

28 也有部分南海鴿友認為北海比較容易，南海較難。主要是因為南海比賽幼鴿年齡較小，體力和實力發展尚未完全，變數更大，因此難度更高。如受訪者 L 所說的：「他們南部很……對這個百日賽……非常的……沉迷，因為你仔鴿小孩子，你要掌控牠，不太容易。」

都按照時程進行比賽。海翔比賽時因此可能遭遇濃霧、下雨、逆風、悶熱等難以預期的障礙，使得比賽結果未必完全和鴿友知識、技術與經驗相關，例如鴿友常擔心鴿子受群性影響，在海上放飛出籠的剎那，被「夾在那群要迷航的鴿子裡面，出不來」（受訪者 H）。受訪者 F 表示：

它（海翔）影響的因素太多了。第一個是天候，因為你海上放出來之後，鴿子都會成群，牠們單獨會分開的很少。因為牠們沒有自信，在前面飛。所以一般來說分兩群，一群就是往相反方向，一群就是飛回來了。可是你平常訓練很多次的話，你也可能去跟到那一群，因為牠整個在外面飛，沒辦法抽身，牠就會跟著飛。所以為什麼陸上可以訓練那麼多，海上你訓練多沒用。海上牠們出海去訓練很多次，一放還是一樣，都不回來。

於是，鴿友得重新在海翔試煉中，不斷調整自己的訓養、管理方法，將這些經驗轉化為獨門祕訣，諸如斯巴達式體能操練、強調自然探索的訓練法，或是「鳥為食亡」的飢餓返巢法等，每個人都有自家「撇步」誘使鴿子順利返航，希望以理性可控的因素戰勝不可控的機運。在血統之外，鴿友還各自歸納出對鴿子智能、性格或其他多重因素影響的評判，如受訪者 H 認為：

天候不好下雨、能見度太低、濃霧太多，那些飛行能力好的鴿子，大部分都沒有辦法，風向不對，大部分都沒有……最後回來的，常常是屬於那些在船旁邊觀望、細心、很小心，然後飛行速度沒有很好的，然後在那邊等，就比較慎重考慮事情那種的，常常是那種鴿子回來。

受訪者 D 則諷刺地評論海翔制後：「我看大家在改變，好像還是

沒有找到邏輯啊。」當然，並非每位鴿友都找不出科學理性可解釋的贏的邏輯，我們的受訪者泰半相信，賽鴿是科學理性和運氣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們認為強豪已累積相當實力、掌握了贏的訣竅；但也表示大多數人其實還在試誤，比賽多半是陪榜的。鴿友最後多歸納，賽鴿一翻兩瞪眼，最後就是「比比看才會知道」。畢竟海翔賽裡機運、天氣、不可掌握的因素實在太多，很難說鴿友所信奉的育種知識或訓練技術，一定會取得翔績回報，但多數人仍然相信育種和訓練是實力的基礎，至少操之在己。鴿友於是試著重複摸索與調整，饒富興味地在每一次失敗與成功中累積經驗和實力，以對抗海翔賽事中的高度不確定性。

（三）團體賽而非個體賽：下注的不確定性

除了育種、氣候等不可知的機運影響，台灣賽鴿的插組賭法亦增加了不確定性。複雜插賭規則看似增加了賭的多樣性和彩金的分散，但結果卻更取決於選組合時的運氣和資本規模。賽鴿的輸贏可分兩個層面，一是比贏（鴿子在時限內飛得回來又飛得快），另一是下注賭贏。比贏只是賭贏的必要條件，但絕不是充分條件。由於台灣賽鴿暗組彩金往往比明組腳環獎金來得高，就算鴿子順利返巢、入賞（取得好的名次）²⁹ 也不見得贏到錢；因此鴿友往往更關注贏錢多寡，而這取決於鴿友如何下注、是否剛好下賭金在歸返的鴿子上。

其中，「多隻組」下注是台灣賽鴿獨步全球的困難玩法，更增添博弈的運氣成分。插組除了單隻下注，還可下注「多隻組」，也就是把好幾隻的鴿子表現綁在一起賭（例如雙隻、三隻、四隻、五隻組等等）。亦即，這樣的玩法與國外賽制只在意哪隻鴿子最快歸返不同，更和鴿主能否猜中多隻鴿子的共同表現有關。但組合愈多隻，鴿主愈難確定組內所有鴿子都可成功歸返，賠率愈大。面對這種不確定性，

29 明組入賞是以全部比賽的鴿子中，取一定比例的鴿子來頒給賞等。例如有的鴿會是每 150 隻取一賞等。這樣如果一共有 3000 隻鴿子比賽，就可以有 20 隻鴿子「入賞」。鴿會會制訂明組和暗組的賞等比例，每個鴿會不盡相同。

鴿友 D 評論：「但是台灣是團隊，比的是團隊……搞不好你飛得很快，也沒錢，因為你只有一隻啊。」受訪者 G 則說：「你投注的多，你要繳納的費用就高，然後中獎機率就高，未必會贏，但是中獎機率高。」這顯示如何插組，一方面得靠鴿友對鴿子能力的評估，另一方面也受資本額多寡影響，因此鴿友會根據自身的條件，發展不同策略來降低賭輸的風險、增加贏的機會，這我們留待下一節進一步討論。

整體來說，高難度賽制所造成「機運式的公平」，令結果更受實力難預知、天候海象、插組運氣等因素影響，更難掌握穩贏的訣竅。但鴿友反而認為，這才是台灣賽鴿的迷人之處，添增了樂趣、刺激和遊戲感，也激發他們鑽研獨門祕訣的興味。鴿友們強調賽鴿「不比不會知道」、「要實際飛了之後，才能印證牠好不好，光是看看不出來」（受訪者 B）。

受訪鴿友常評論，賽鴿世界裡沒有永遠的贏家，津津樂道某鴿友大贏大輸、大起大落的案例。我們發現，台灣賽鴿賽制因同時混合了科學理性的計算和上天決定的機運，也影響了鴿友對比賽輸贏的詮釋。雖然機運總如影隨形，但鴿友似乎能透過鑽研訣竅、累積經驗提昇贏的機會，不同玩家看待機運遂有不同的態度：較常贏的強豪志在「戰勝機運」，摸索出挑戰不可控因素的獨門訣竅；較常輸的業餘者則將成敗「歸責機運」，甚或「寄望機運」眷顧，像是表示自己技不如人、運氣不好，或願賭服輸等等。玩家不論輸贏都傾向將成敗歸因為個人，更強化了進取精神，不斷檢討自己輸贏的理由，也同時暗自祈禱機運幫助。

雖然台灣賽制使得運氣影響大幅提高，但多數鴿友仍相信自己具掌控性，或認為「機運式公平」是自己的利基，而未必是限制。受訪者 D 的訪問就精準地呈現，控制與機運這兩個特質，如何在賽鴿活動中同時存在：

而且這些自己都在你掌握之中，不像股票，投進去，喔！很多人要賣的時候……找不到人可以買……因為輪不到你啊。

電話打也沒人要給你處理嘛對不對？但是鴿子不一樣，比大比小都可能贏，你昨天賭二十萬，搞不好這幾天贏一千萬，為什麼？一群鴿子飛回來，就這樣沒幾隻，十隻，剛好你那隻又插很重，一封插了幾十萬塊，沒（其他）人回來啊，全部拔起來啊！

受訪者 K 也同樣表示：

你簽牌（指大家樂或六合彩），畫了畫了就交給別人了（台語），一翻兩瞪眼，你，你有辦法去掌控他嗎？幫他瞪眼嗎？（笑）沒有辦法嘛。鴿子為什麼會興盛，從小到大都是你在弄的，從小，到大都是你在弄的，你在種果，啊那剩下（就是）結出來的果。

在此我們看到台灣獨特賽制不但維繫了參與者的公平感，還進一步形塑了鴿友個人的慾望、興趣和信念。受訪鴿友評論賽鴿和六合彩等純靠運氣的賭博不一樣，認為他們投入了配種、訓練、下注與資金，有機會摸索出戰勝不確定性的訣竅。或許，我們可以用受訪者 D 的分析來總結鴿友的共同信念：「因為每一季都有每一季新的希望。然後每一個人……然後每一季都不是固定的人在贏。所以每個都有機會，人人有機會，個個沒把握。」

如同吳宗昇(2011)分析股票市場時，指出股票市場的種種不確定性，以及行動者能動的可能性，使得股民感受到在這個社會空間，有可能拉近原有社會階級與不對等的實質差距，似乎反轉了現實的結構空間，成為「人人有機會、天天有希望」的經濟社會空間。海翔制雖減少網鴿、AB 櫥等舞弊可能，卻讓不確定性大增，鴿友更難捉摸賽鴿實力、更難累積知識技術，以及更難預測團體表現插組；但這反而帶來了促成人人「平等」的效果：不論強豪或小戶都有機會贏，因此讓賽鴿成為一個「人人有機會」，但卻「個個沒把握」的活動。在下一節裡，我們將分析鴿友如何面對賽鴿賭輸的風險，以及他們如何透

過社會互動發展出多元的贏的策略，克服困難遊戲規則帶來的難題。

七、鴿友多樣的比贏邏輯與賭贏策略

混合了科學理性和機運影響的賽制，讓鴿友雖然明白賽鴿一定有風險，但仍努力嘗試用科學理性來管控風險、對抗不確定性。持續參賽的鴿友，因此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資本條件評估，發展出個人迥異的管控風險策略和合作聯盟。就這層意義來說，鴿友的賭博，的確和一般買六合彩、大家樂等較被動面對機運安排的賭法不同，他們更強調主動迎向風險、試圖掌握可控制的元素來控制風險。

鴿友所發展出的贏的訣竅，可區分為兩個層面：比贏（累積實力）和賭贏（插組策略）。爲了比贏，鴿友極富實驗精神，嘗試研發執行一連串自己相信的育種、訓練和管理邏輯，來累積比贏實力、對抗機運。爲了賭贏，有的鴿友則透過聚集經濟資本，發展出不同集資合作方式，以對抗下注的不確定性。我們以強調實力或憑藉機運、以及鴿友經濟資本多寡，作爲在這個經濟社會空間行動的兩條軸線，區分出四種類型的鴿友（參見圖 1）。

第一種類型是強豪。鴿友眼中的強豪既具備堅強實力，又擁有充裕資金，有較高的機會比贏和賭贏，例如受訪者 M 就是眾人眼中的強豪，他在鄉下長大，兒時就有養鴿的興趣，高二起投入賽鴿，將它視爲結合興趣的事業經營，自海上競翔以來累積綜合冠軍紀錄近 20 次，鴿舍的種鴿規模高達 300 羽，鴿園規模龐大。類似 M 的強豪擁有充裕的資金作後盾，不僅能爲插注贏錢打下基礎，也能購買名貴血統鴿，或購置昂貴保健品以提高實力。

不過，並不是每個鴿友都像 M 一樣擁有資金的條件，第二種類型是被認爲有實力、卻較缺乏資金的專業者。專業者又可區分為專業教練，或自己作翔³⁰的專職鴿友。他們全職投入賽鴿活動，不斷累積經

30 賽鴿用語中，「作翔」指的是由自己育種、照顧與訓練鴿子。「作出」指的是種鴿提供者，而「使翔者」則指負責訓練鴿子的教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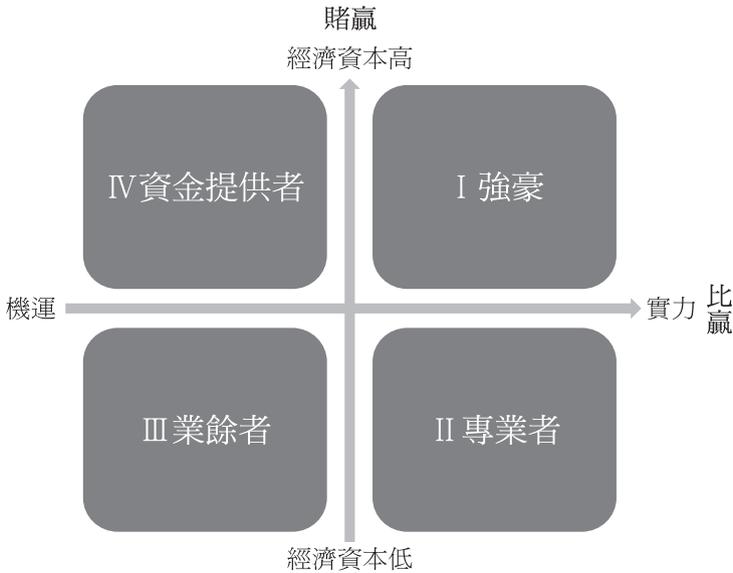


圖 1 鴿友的比贏邏輯與賭贏策略類型圖

驗，鑽研血統、育種及訓練技術等。

第三種類型是鴿友口中最常見的小戶業餘者，他們因尚未摸索出訣竅、資金也不充裕，因此可能將賽鴿視為業餘消遣，在資本的限制下小規模地參與，很多仍在不斷試誤。不過業餘者並非沒有贏的機會，他們也可透過集資、合作等，彌補自己的劣勢，摸索贏的訣竅。

最後一種則是有錢但沒有心力研究摸索的資金提供者。這些外圍賭客可能是大老闆或鴿友的親朋好友，出資和其他三類鴿友合作參與賽鴿。幾乎所有鴿友的努力目標，都是成為第一象限裡實力和財力兼具的強豪。不過在此我們要強調，這個對鴿友的理念型分類並非僵固不變，它很可能隨著鴿友比賽結果、資金輸贏情況，以及彼此互動策略而位移調整。接下來，我們將分析不同類型鴿友，如何因應海翔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發展出不同的比贏邏輯和賭贏策略，以降低經濟風險。

（一）累積實力對抗不確定性

強豪和專業者較強調比贏靠實力，他們試著盡快因應海翔賽制的新挑戰，掌握贏的祕訣，如鑽研血統、訓練、管理、用藥技術等等，打造出台灣鴿界多元的知識技術圖譜。相較其他鴿友，這類鴿友堅信科學理性能夠累積實力、較常駁斥機運影響，傾向相信自己可戰勝運氣。舉例來說，強豪 M 完全不相信鴿子可憑藉運氣飛回，認為一隻血統好、具天分的鴿子，放飛前就已找好方向，不可能誤入迷失方向的鴿群，他說：「運氣應該來講，是那些輸的人的藉口啦……像其他的人家說的運氣，運氣返來ㄟ（台語），那個我覺得是沒有啦，一定要有實力才會回來啦……。」

專業者 G 也強調實力是贏最重要的基礎：「因為你不是參加一次比賽……運氣不可能永遠那麼差啊。但是，一旦你沒有種鴿的實力和訓練的能力的話，運氣不可能永遠站在你這邊。」其中，資金充裕的強豪，較有能力投資引進國內外的血統名鴿育種，增加鴿舍實力；戰績輝煌的鴿友還可進軍育種生意來獲利。至於缺少資金的專業者，雖無法斥資投資名鴿，也可透過人際網絡、商請朋友贈與名鴿或相互配對等來提高實力。

那些被認同為實力堅強的鴿友認為，實力才是賭贏的必要條件；唯有實力夠堅強才能挑選到「對」的組合，受訪者 M 說：

你插組有插準，這個就牽扯到你的經驗，還有你種鴿過去的經驗。你插的準不準，如果三十隻，你如何把三隻（會贏的）插得在一起，這個就看個人的能力。

鴿友因此通常不願對他人傾囊相授自己的訣竅，以避免別人贏錢削弱自己的機會，藉此管控個人經濟風險。不過，在某些能產生人際信任的情況下，還是有鴿友發展出各種技術分工、增強實力的合作策略。例如強豪 M 願意在仔細評估後和其他專業鴿友合作，由他提供種鴿、傳授知識技術，對方負責照顧與訓練，相關的開支和賭金則平均

分攤，他表示：

像我們方式就是大部分是人家來找我們，他們有需要；那我的合作方式就是說我鴿子，我出那個鴿子去、出那個技術去，那他負責訓練、負責開支，啊賭金就一人一半。這樣就是說，他不怕沒有技術，我會提供，第二他不用養種鴿，因為我有種鴿，對啊，他就是有這個好處。我有什麼好處？我減少開支，就是說、再來就是說……我可以多參加一個鴿會這樣。不然台灣那麼多鴿會，你要怎麼去處理，對不對？

整體來說，像 M 這類技術傳授的合作方式較少見，而以朋友間相互「寄櫥」³¹（見下節）但比賽各憑本事的合作較常見；不過 M 認為謹慎挑選合作對象可以是雙贏策略。也有業餘者尋找專業教練（或稱使翔者）合作，自己提供種鴿與賭資，請教練負責照顧與訓練鴿子。專業教練的經濟收入是管理和訓練費，加上贏得獎金時的佣金抽成。近來也有越來越多鴿友發展出類似集資集團式的玩法，一同聘請專業教練協助訓練進行比賽，透過專業分工累積比贏實力。

（二）集資提高賭贏的機會

鴿友一致同意，比贏靠實力，賭贏則仰賴運氣和資本額：「賭博就是現實問題嘛，資金大的就占便宜啊」（受訪者 M）。資本大的優勢在於下注時，能對所有的排列組合都挹注賭金（俗稱「連碰」），只要其中一組鴿子飛回，便能齊組分得彩金：

你比十隻你抓二隻出來插組，你二十隻全部插組，你回來就是插組的呀，你十隻要回來那兩隻你有插的，你才有贏啊，

31 「寄櫥」（或「寄養」）意指將自己作出的鴿子，交由信任的友人負責照顧與訓練，並提供賭金，與友人的鴿子一起參賽。通常雙方會事先協議好獎金的分配比例，如友人可抽二成到三成的佣金。

台語就是「搏偏筊」(phinn-thâu kiáu)，資金大的比較占便宜啊……資金大的他全部用連碰的，下來兩隻兩隻組齊呀，下來三隻三隻組齊呀，所以他賭大的全部連碰，你賭小的你有可能選五組、十組，啊你要齊組機率就很低，他要齊組很簡單，他兩隻下來就齊組了。啊這個就是不同的地方。(受訪者 M)

受訪者 L 用「我們是等組頭、他們是等鳥」，一語道盡缺乏資金的業餘者或專業者的無奈；他們只能等待自己下注的組合歸返。有時雖然鴿子飛回來了，卻礙於資金不夠沒有下注這幾隻，因此得不到彩金。相反地，資金充裕的鴿友可以隻隻下注，只要有鴿子飛回就有齊組機會。

當然，資本額的弱勢也可靠其他策略彌補。鴿友間發展出多種集結資金的合作方式，例如尋找第四類資金提供者進行投資，或在強豪、專業者、業餘者間發展出聘請教練之外更多樣的合作形式，形成有錢出錢、沒錢出力的社會分工，提高了小戶鴿友的賭贏機會：

現在幾乎投資的都是一些做老闆的在投資，因為現在生意不好做嘛，啊就要投資鴿子比較快，他六個月就可以收了，而且投資報酬率高。為什麼資金會那麼多？就是有這些老闆出來投資，才會資金那麼多。你要靠那些做工的，資金哪有可能那麼多啊？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工嘛！（受訪者 M）

對許多小戶業餘者來說，單獨參加賽鴿是一筆為數不小的開支，³² 因此有的鴿友風險控管的方式，是只挑自己擅長的季節參賽，或者採

32 受訪者 L 指出，以他所參與的鴿會為例，一季比賽光報名十隻鴿子（一個鴿舍至少要報十隻），腳環費與報名費就要三萬五千元，加上鴿會對插組最低的下注規定，需要再花費一萬五千元，最基本的開銷就要五萬元。若加上自己額外的下注，每一關可下注五千至八十萬，總共五關。受訪者 F 則計算，平均一隻鴿子下場比賽的成本約是兩萬五千元。

用「寄櫥」降低經濟投入。以受訪者 E 和 L 的相互寄櫥為例，E 是公務員，只作翔春季比賽，2015 年春季時自己培育 15 隻選手鴿，而 L 則「作」出 5 隻鴿「寄」在他的鴿舍，由他代為照顧與訓練，並提供賭資加入春季鴿賽。到了冬季比賽，則變成 E 作出 5 隻鴿子寄櫥到 L 的鴿舍。「寄櫥」的合作策略減少了業餘者每季獨立參賽的開支，透過寄放友人鴿舍的小額投資分散風險，也就是 M 所說的「資本少的玩法」。L 亦談到自己曾讓一位業餘鐵工只寄櫥一隻鴿子，最後卻贏得一千兩百萬彩金的例子，他本身則從這種合作方式中獲得了兩成抽佣，雙方都從「寄櫥」關係獲益，證明小戶玩家合作也能創造贏的機會。

以上這些不同技術或集資合作方式若要能穩固維持，共同點都是事先謹慎評估、談妥經濟分配（費用分攤、插組資金來源、抽成比例）的條件，以避免比賽後因彩金分配糾紛，導致合作關係的瓦解。也就是說，鴿友間的人際信任，會隨著彼此合作關係開展和實際互動而逐漸變動，有可能視比賽和獎金分配結果導致彼此更緊密合作，但也可能因經濟糾紛而拆夥。

（三）和運氣對賭

眾多還在摸索訣竅且缺乏資金的業餘鴿友，他們看似缺乏優勢，但還是可以寄望機運眷顧，因此也不會喪失參賽興致。這類參與者雖然認同實力很重要，不過如同 J 所說，摸索的過程就像「一直在霧裡面抓東西」，很難找到規則。輸家往往將比賽結果歸責運氣：「你比賽的運氣不好，就真的前功盡棄，最後還是要有運氣！」（受訪者 J）。

不過業餘者多半相信，幼鴿海翔多關賽制所造成的不確定性，未必是限制，反而可能是機會。鴿友多可輕易舉出業餘小戶贏錢的例子，評論不起眼的鴿仍可能立大功：「有時候……那個鳥店裡面隨便五十塊、一百塊，抓個鴿子回去，這樣跟牠配對後，竟然會給牠飛入賞喔」（受訪者 L）。買不到昂貴種鴿的業餘者，因此依然懷抱希望。

鴿友 D 甚至分析，有時運氣好可能比血統、訓練影響還大：「搞不好（其他鴿子都在海上迷途），牠停在船上，然後船就開回來了，牠就飛回來了……就像你要去讀大學、考大學一樣，正常的運作之下，（實力很重要）再進去就是靠運氣了嘛，不是嗎？」

也有受訪者直言，下注本身就是比運氣：「你每一個人都在挑（組合），但每一季每一個人挑不一樣。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所以我跟你講這是運氣」（受訪者 D）。另外如受訪者 H 分析，海翔的不確定性讓實力與資金不具優勢的業餘者仍有贏的機會：

有時候小戶在海上如果說，像運氣好的話，我們那邊有警界的人……他就積了五、六隻鴿子啊，賭了十幾二十萬啊，然後他就插（組）每一次都二、三萬，二、三萬這樣，結果他拿了二千多萬……他是小戶啊，而且是寄養的，才寄養了五、六隻鴿子，你看他有多少倍數，上百倍耶，就很吸引人啊。啊我連輸三次、五次都沒關係，讓我碰到一次，我本收回來，還贏很多耶，對不對。所以他們敢賭、有期待，就好像簽樂透、簽六合彩一樣，就是簽了就有希望的那種感覺啦，所以大家都有點期待。

海翔所產生的「機運式公平」感受，令大多數業餘者即使不確定自己的實力，還是願意試試看，懷抱著贏的希望：「他即使養工不怎麼樣，種鴿是誰，但你不能小看他，搞不好他收著、收著，蹦！就回來了」（受訪者 L）。這種等待運氣的心態，說明為什麼業餘小戶看似缺乏優勢，卻還是持續費時、費心投入。

幼鴿、海翔、多關賽制衍生的不確定性，讓鴿友各自發展出訴諸科學理性、經濟資本，或訴諸運氣等不同挑戰機運的方式。每個人都可評估自身實力和資本條件，以及和合作鴿友的關係，發展出不同結盟合作方式，來控管賭博輸贏的風險；即使缺乏實力和賭本，還是可寄望運氣眷顧。鴿友間彼此挹注資金，或發展出不同技術合作的複雜

互動模式，可看成是他們主動迎向風險、試圖控制比賽不確定性的手段。由於鴿友認為實力和運氣都很重要，所以他們可以片面擴大對自己有利因素的影響，相信自己掌握可控性或機運可能眷顧，產生如行為心理學所說的過度自信 (overconfidence) 的心態 (Taylor and Brown 1988; Camerer and Lovallo 1999)，認為自己贏的機會比實際來得高；其中具實力者多強調自己的優勢，業餘小戶則放大機運的效果。不論自身條件為何，參與鴿友都各自努力掌控了風險，並且再生產會贏的信念。

八、追求公平性的社會效果

台灣賽鴿社群追求公平的賽制變遷，顯示出集體行動可建構和修正制度，而制度穩定後也會反過來影響個人動機，逐漸塑造了今日我們認識的剽悍、神祕且遊走法律邊緣的台灣賽鴿社群。但賽制和遊戲規則影響的不只是鴿友動機而已，我們發現它也造成其他社會效應，像是經濟立足點和分配的不平等、侵蝕社群連結感、以及成本外部化讓鴿界和外在社會更形隔閡等現象。

(一) 公平背後的經濟不平等

如前所述，受訪鴿友常評論經濟資本造成起點不公平。如同 M 分析的「資金大的比較占便宜」，受訪者 F 雖一邊說著規則是公平的，但一邊又強調比賽分配結果往往不公平。他說：「那你要看哪方面的不公平嘛，事實上是整個就不公平，對那百分之八十是不公平……我說實在的，是拿錢給別人花……大家都認真在養，搞不好都贏不到錢，對不對，還沒有贏到錢咧。」

事實上，多數鴿友也看穿了經濟資本對贏錢機會的影響，不過因為活動讓大家懷抱人人有機會的夢想，輸家只能想辦法累積實力，或歸咎運氣影響、嘗試扳回一城。輸家會在能力許可下發展出各種贏的策略，也大多認同願賭服輸，較少質疑遊戲分配結果。

（二）經濟利益侵蝕社群聯結感：沒有人跟你說真話

賽鴿結合科學理性和機運成分的賭博特質，再加上龐大經濟利益的糾葛，讓鴿友互動關係很異質多元；社群內既可能出現合作關係，但也可能分化隔閡。如同參與者對制度或鴿會的信任，常須透過遊戲規則的調整來確保，鴿友和鴿友間的信任，同樣也需要透過彼此互動不斷評估成形。由於涉及大額經濟利益，鴿友間的信任未必能輕易從舊有人際關係中轉化，新合作關係的建立常需雙方評估、試探和磨合；萬一比賽過程或結果涉及互動與分配的衝突，人際關係就可能因此動搖。

更有趣的是，因為鴿友相信賽鴿的實力涉及血統、知識和技術等，所以鴿界普遍有提防獨門訣竅外流的心態，以避免增添不熟悉的人贏的機會、造成自己的損失，這也可以說是一種鴿友降低自身經濟風險的手段。

在鴿界多元競逐的知識圖譜中，每個人都有一套贏的「眉角」：有的信奉獨到配種手法、有的重視鴿子體型、觸摸的手感、有的在訓練功夫、有的則善用藥物或保健配方。受訪鴿友多強調，真正的祕訣不會隨便教人，例如受訪者 B 說：「講到祕訣吼，十個有十一個都是跟你講假的啦，誰要跟你說。」J 亦在訪談中不斷論及經濟利益如何侵蝕社會信任，例如：「利用個人比較多啦，沒有人會跟你講啦」、「沒有人會跟你說實話」、「沒有人會把生財的工具交給你……最好的鴿子你絕對摸不到，在人家家裡……你今天東西不好才會賣出來嘛，你會賣好東西出來嗎？」、「如果賣鴿者的鴿真的會賺錢，為什麼還要賣給你？！」

受訪者 L 也分析，除非有特殊私人或合作關係，否則鴿友間不會彼此傳授祕訣：

就像武功一樣嘛，對不對，練武功嘛對不對，你要想說我這個是一個絕世武功嘛，武林界我這武功是最棒的，沒有一個特別……特別的關係，特別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教你的。所

以最妙就是你現在講到重點，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鴿友，都是閉門造車啦，活在那世界裡面，就我的鴿子最棒，那因為我的鴿子最好，沒有比你怎麼知道，所以還沒有比之下，大家拳頭都很硬、嘴巴也很硬。

參與賽鴿活動已數十年的鴿友 G、L、M 隨即表示，隨著賽鴿制度演化，他們感受到早期鴿友單純愛鴿子的感動逐漸淡了，愈來愈多人只看重利益。涉及賭金利益分配，鴿友的個人信任可能因為經濟利益衝突較難建立。若要和原先不熟悉的鴿友建立起穩定合作，通常還得經過評估人品、合作過程中試探磨合，以及賭資分配結果是否公平、彼此能否信服等一連串過程的考驗。原本關係不夠緊密的鴿友間，不是較難建立合作分享，就是隱含著因經濟關係破裂而瓦解的威脅，為鴿友社會互動埋下不穩定因子。

鴿友 J 的說法，或許可為這種鴿友間隱含的緊張關係下個註腳：「鴿界是孤獨的一條路，沒有人會跟你交心。」J 的說法雖然比較極端，但也顯示鴿友間雖仍可能合作，但也普遍存在著對外人留一手、防著別人偷技術的心態；即使是彼此寄櫥的朋友，多半也認為鴿主不應介入訓練管理，以避免技巧外流或彼此觀點不同的紛爭。這樣的社會關係，顯示信任並非是地下經濟理所當然的基礎，而可能出現異質、動態演化，甚至破滅的現象（葉俊男 2012；馬財專 2010）。鴿友普遍留一手、不會輕易給予人際信任的態度，更顯示出這類賭博活動中，經濟與社會行動間相互滲透、侵蝕的複雜關係。

（三）其他社會成本與效應

最後，賽制的影響不只限於社群內部，也可能外部化，影響著鴿界與外在社會的關係，讓賽鴿一直蒙上神祕面紗。舉例來說，賽鴿活動一直遭受違法、浪費國家資源和傷害動物權的批評，使得鴿友多半低調，避免向非鴿友透露自身賽鴿生涯。2012 年監察院曾糾舉行政院，指出國家不控管賽鴿導致龐大稅賦流失，還利用納稅人的錢處理

網鴿、賽鴿等糾紛。監察院因此建議賽鴿活動應予以地上化，由行政部門加以輔導、管理、課稅和查緝；但鴿友多數反對國家介入與課稅，寧願博弈活動維持地下化。³³

除此之外，2014年美國動物保護團體 PETA 也向警政署抗議，指控台灣海翔制違反動物權，導致大量賽鴿死亡；隔年 PETA 更公開側錄海翔影像，在國際間引起動物權爭議。此舉引發許多鴿友反彈、抗議，強調自己在比賽期無微不至照護鴿子，是愛鴿而非虐鴿。但我們受訪者中也有人對此提出反省，例如受訪者 L 和 F 都批評了南海百日幼鴿賽不人道：

那鴿子在比賽還唧唧叫的啦，可是咕嚕咕嚕的，唧唧這樣子。（受訪者 L）

就是從出生到比賽就只有一百天，就只有三個多月，那非常殘忍的，那簡直叫小朋友去跑馬拉松一樣。那個就是說因為競爭激烈，有些會（鴿會），可能我三個月我賣腳環完了，我就趕快辦下一季。所以那都是站在人的思維去思考、站在錢的立場去思考。不是為鳥的利益、沒有動物福利的問題。不去思考這方面。每一次比賽完之後，鴿子就沒用了。（受訪者 F）

從比賽彩金未必分散、鴿友慣常留一手及動物權等爭議，我們可看出台灣賽鴿創生機運式公平的賽制，深深影響了鴿友彼此互動，以及鴿界和外在社會互動的關係，在這個經濟社會空間的內部和外部產生其他效應和爭議。

33 鴿友中也有贊成國家介入管理的。例如 H 就認為如果國家介入管理，並規定賽鴿交易買賣課稅，將有利國家稅收。

九、結論

本研究探討台灣為何發展出獨步全球的艱難賽鴿制度，以及它如何穩固了這樣龐大的地下經濟。我們發現賽制轉化有其爲了賭博防弊、控管風險的歷史成因；幼鴿海翔多關賽制的創生，強化了立足點公平，令比賽成爲結合科學理性，但機運成分也大增的賭博遊戲，造成抑制強勢者優勢的「機運式公平」，並進一步形塑了這個社群的特殊性格和互動關係。令人意外的是，機運大幅影響結果，不但絲毫不損鴿友意願，反而更刺激了他們對「人人有機會」的想望，甚至認爲這才是賽鴿令人著迷之處，激勵了眾人不斷去鑽研技術知識，投入這樣極其困難、成本高昂但贏率極低的比賽。不管是像受訪者 G 或 L 表示自己是因興趣而投入賽鴿，還是像 J 所說大部分賽鴿者「都是因爲貪」，賽鴿制度和社會互動機制成功凝聚了動機不同的鴿友參與，讓台灣賽鴿社群多元且充滿活力。然而我們也看到，台灣的困難賽制雖然大幅減少了人爲操控和舞弊等風險，卻也衍生新的風險和社會效果，像是賽制過度挑戰鴿子極限，結果大受天候、機運左右等等，活動也因此蒙上不人道、違法和賭徒心態等陰影，使賽鴿成爲既是「台灣之光」亦是「台灣之恥」的矛盾組合。

過去的賭博研究多探究個人動機，或是個人如何適應特定博弈市場條件的安排據以行動，缺乏對賭博規則和個人行動間關係演化的討論。本研究發現，博弈行動者具有進一步修改或調整制度規則的強大能動性，他們不只推動了制度的修正，營造眾人對制度的集體信任，還會依據自身條件，形成複雜策略聯盟來控管個人經濟風險。鴿友透過參與賽制建構和調整，逐漸共享「公平」、「個人努力可能挑戰機運」等集體價值，不斷再生產對賽鴿的認同。

除此之外，過去地下經濟文獻多探討因社會連帶和人際關係所產生的信任，如何協助穩定交易並規避風險，鮮少觸碰基於社會制度或互動機制所產生的信任。賽鴿結合「合法競技和非法博弈」的灰色性

格，使得它相對其他地下經濟來說，不單只能仰賴人際網絡或個人信任來穩固賭博交易，還可藉由遊戲規則的制度性信任和社會互動來確保，發展出集體和個人等不同層面的風險控管策略。在賽鴿活動中，行動者除了透過建立綿密網絡或個人聲望之外，亦可透過集體建構公平的遊戲規則的方式，來避免體系的不穩定。舉例來說，各個鴿會藉由嚴格防弊措施、微調插組規則來贏取鴿友信任；鴿友間也會依自己的條件，各自發展出比（賭）贏邏輯或合縱聯盟，來對抗機運、控管經濟損失的風險。社群整體都逐漸發展出各種相互監督、分散彩金和避免祕訣外流等策略，以維持社群互動的穩定性。

至於博弈中的社會關係究竟是什麼樣貌？過去地下經濟研究多著重分析，參與者在進入交易前就已存在的人際關係和信任，常忽略人際信任的動態變化，還有結構條件為何可能導致信任較難建立的特殊情境。本研究顯示，鴿友的制度性信任和個人信任，都有賴各方持續協商打造。鴿友間雖因賽制變化共享對賽鴿的狂熱和公平感，但也普遍有彼此忌憚或留一手的心態。雖然部分鴿友可能為了贏進行策略聯盟，但也正因為鴿友堅信血統、知識或經驗是贏的關鍵，所以常會提防祕訣外流導致自己經濟損失風險。也就是說，結合了「可控的科學理性和不可控機運」的賽鴿博弈成了雙面刃，鴿友可能過度放大知識或經驗的「可控性」因素影響，因而使得社會的互動與信任朝向不同的方向推移——經濟利益既可能促成參與者的技術或資本結盟，也可能轉而侵蝕彼此交流與社會連帶的建立，在實際互動過程中，塑造出台灣鴿界既可能合作又彼此提防的特殊社群文化。

本文解釋了制度變遷如何影響鴿友經驗的動態過程，以及台灣鴿友凝聚和分化的社會動力，補充了過去學術研究中對賽鴿這項龐大、非正式地下經濟活動的認識空缺。我們研究發現，台灣賽鴿結合「合法競技和非法博弈」、「可控的科學理性和不可控機運」的制度特質，造成鴿友特殊的心理和社會互動效果，也顯示出經濟和社會間既可能相互穿透，卻又隱含緊張和脆弱的複雜動態關係。

誌謝：本研究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謝文中受訪對象願意受我們叨擾，並慷慨分享他們的經驗，才讓我們有機會瞭解賽鴿社群文化和社會互動；惜礙於匿名原則，難以在此一一點名致謝。此外，田野訪談過程中，獲得黃榮火、邱靜慧、徐銘謙的重要幫助；謝達文、游羽棠、柯穎瑄、黃士珏、黃袖舒、蔡潔凡等同學協助繕打逐字稿；論文撰寫時亦獲得黃于玲、陳宇翔提供寶貴意見；都對我們寫作有莫大幫助，特此感謝。最後，要謝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和編委會提供的精闢修改建議，協助我們聚焦和釐清理論觀點、深化既有分析，在此一併致謝。當然，本文若有疏漏之處，概由筆者自行負責。

參考文獻

- 王淳堯，2007，《台灣賽鴿文化「空」景之研究——以中部二鄉鎮為例》。台中：東海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
- 尹培華，2007，台灣海上競翔發展史。6月5日，116賽鴿網（<http://www.116foto.com/NET20/Article/Detail.aspx?AT=1&AMId=13>，取用日期：2015年3月8日）。
- 吳宗昇，2011，〈資訊的重量：台灣股市的社會構造〉。《台灣社會學刊》47: 45-89。
- 沈可尚，2006，綻放真台灣系列：《賽鴿風雲》紀錄片。台北：巨圖科技。
- 邢淵博，2013，《台灣賽鴿的社會學分析》。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佳穎，2008，《影響鴿友沉迷賽鴿活動之相關因素研究》。台中：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碩士論文。
- 范育源，2014，《竊鴿勒贖犯罪型態與警察偵查作為之研究》。台北：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馬財專，2010，〈台灣組織及個體販毒網絡之質化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2(3): 353-392。
- 康涵真，1994，〈關係運作與法律的邊緣化：台灣中小型企業非正式融資活動的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7: 1-40。
- 黃瓊祐，2012，《竊鴿勒贖被害特性及其防制對策之研究》。桃園：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瑞貞，2007，《海上賽鴿管理策略之研究——以南部海上賽鴿協會為例》。台中：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碩士論文。
- 葉俊男，2012，《「無免法律的所在」：臺灣地下六合彩交易體系的考察》。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 溫偉勝，2011，《賽鴿賭博成因及行為模式之研究：以台南市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人儔，1962，〈發刊詞〉。《台灣信鴿》1: 1-3。
- 羅家德，2001，〈人際關係連帶、信任與關係金融：以鑲嵌性觀點研究台灣民間借貸〉。頁 223-261，收入張維安編，《台灣的企業組織結構與競爭力》。台北：聯經。
- Camerer, Colin and Dan Lovallo. 1999. "Overconfidence and Excess Entry: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1): 306-318.
- Cassidy, Rebecca, Andrea Pisac and Claire Loussouarn, eds. 2013.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Gambling: Exploring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Risk*. London: Routledge.
- Cosgrave, James F. ed. 2006. *The Sociology of Risk and Gambling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 DiMaggio, Paul and Walter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 147-160.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 Jerolmack, Colin. 2013. *The Global Pige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ohnes, Martin. 2007. "Pigeon Racing and Working-class Culture in Britain, c. 1870-1950."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4(3): 361-383.
- Luhmann, Niklas. 1980. *Trust and Power*. New York: Wiley.
- Meyer, John W. and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340-363.
- Polanyi, Karl. 2001[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Puri, Stine Simonsen. 2013. "Betting on People: Bookmaking at Delhi Racecourse." Pp. 140-155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Gambling: Exploring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Risk*, edited by Rebecca Cassidy, Andrea Pisac and Claire Loussouarn. Oxford: Routledge.
- Reith, Gerda. 2002. *The Age of Chance: Gambling and Wester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Taylor, Shelley E. and Jonathon D. Brown. 1988. "Illusion and Well-Be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2):

193-210.

Zucker, Lynne G. 1986. "Production of Trust: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1840-1920."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8: 53-111.